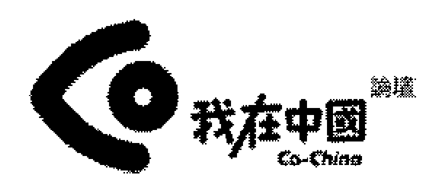


【编者的话】

20 多年前，罗大佑的一首《皇后大道东》唱出了港人对九七回归的疑虑和对前途的担忧。时间一晃，香港已经回归 15 周年，从殖民地到特区，香港经历了很多变化，然而不变的是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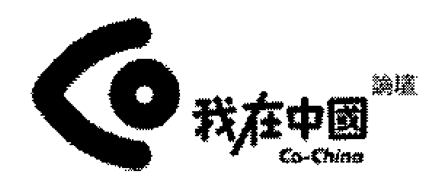
年的七月一日总是有很多港人走上街头，对特区政府和中国大陆提出种种诉求。正如闾丘露薇观察到的，很多不了解香港的内地读者会这样批评香港："英国人统治的时候，你们没有民主，现在为何叫得那样大声？"

其实，说出这种话的人，并不真正了解香港，不明白在殖民地的标签下，香港人的民主意识以及对自由、法治的追求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当人们都在总结回归 15 年的变与不变，畅想香港的未来时，本期 1510 周刊选择回顾 1997 年以前的香港，让我们来看一看：港英政府管治下的香港到底是什么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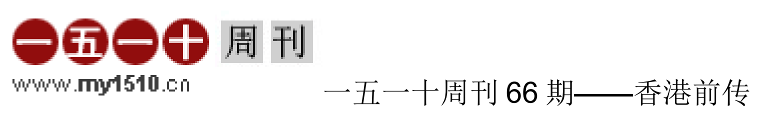
在周刊第一部分，文汇网的整理提供了香港从割让直到回归前历史的一个清晰的脉络，萧若元《香港的命运》节选《港英时代》概括了港英政府的管治策略。而徐梓杰的《那年，一九六七》通过亲历者的回忆，为读者重现香港历史上市民和港英政府发生激烈冲突的"六七暴动"。

周刊第二部分关注九七前的香港人。陈冠中由自身经历讲起，为读者展示了回归前典型的港人心态以及形成的原因，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中国大陆"只是一个带点恐怖、大致上受隔离的陌生邻区"，而殖民地这个标签对他们也没有丝毫影响，"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没有每天仇大苦深想着香港是个殖民地"，"我们只是平凡的长大着，把香港看作一个城市，我们的城市。"而另一方面，作为统治者的港督对香港抱有更大的期望。在许骥的文章中，读者可以看到香港在从柏立基到彭定康这最后六任港督的手中，在种种政策的影响下，如何从一个普通的港口城市晋升到世界性大都市的地位。在这部分的最后，我们收入了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的告别演讲辞，让读者重温这一历史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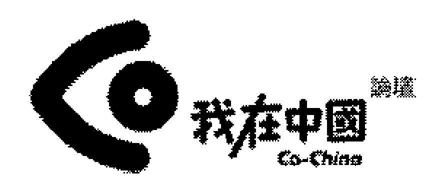
主权交接后香港该如何管治的问题至今仍存在很多争论，如今在香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怀念九七以前的港英政府。在周刊的第三部分，我们试图从多方角度来审视港英政府的管治。李彭广通过对港英管治的研究，指出如今特区政府在管治系统以及培养政治人才上的缺陷。《华尔街日报》编辑 Hugo Restall 认为英国统治香港时更好，而"民主是唯一能与英国管治下的混合式政治负责制匹敌的制度"。



然而，对于怀念殖民统治的想法，石七刀和梁文道有着不同的意见，石七刀通过事实数据和史实，指出港英政府的利民政策其实并没有利民目的；梁文道则认为"当年港英若有'仁政'，那是香港人抗争的成果，绝非政府开恩"，"历史的动力只在我们身上，历史也只应该由我们自己书写。拒绝怀旧，不是为了颂扬现况，而是勇敢地承担该轮到这一代人去承担的责任。"



目 录



【史】

10-1 文汇网：香港发展史之回归前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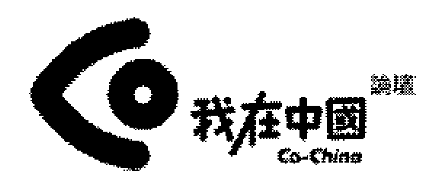
“在 1984 年至 1997 年之间，香港锐化成为全亚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香港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球排十名以内，但巨大的财富却未能掩盖香港人对未来政权更替的忧虑。”

英治初期：香港割让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不久，清朝道光皇帝由主战转向主和，派钦差大臣琦善到广州与英军谈判。1841 年 1 月琦善与义律在清廷与英国政府不知情下草拟《穿鼻草约》，并于 1 月 20 日由义律发出《给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中，宣称他和琦善之间“达成了初步协议”[16]，其中包含“把香港岛和海港割让给英国”，并于 1 月 26 日于香港岛北岸的水坑口登陆。但由于清廷及英国政经界分别认为有辱国体及获利太少，故双方不承认《穿鼻草约》的存在，但英国军方并没有撤出香港岛。直至 1842 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大英帝国打败，并于翌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连同邻近的鸭脷洲才正式割让与英国。

1860 年清廷再败于英法联军，被逼签下《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南部连同邻近的昂船洲一同割让给英国。当时在九龙半岛上的新边界只用矮矮的铁丝网分割，位置就在今天的界限街。

1898 年，英国通过与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及其他一系列租借条约，租借九龙半岛北部、新界和邻近的两百多个离岛，但九龙寨城除外，租期99 年。这一系列的租借和割让，形成了今日香港的边界。



19 世纪中至末

英国于 1842 年正式取得香港岛后，即宣布香港为自由港，是为"香港开埠"。英国的商人，包括鸦片商贩，逐渐将香港建立成与东方自由贸易的枢纽。美国的鸦片商贩及银行家亦有到香港参与跟中国的贸易。

1851 年太平天国起，不少华南商人迁往香港逃避战乱。香港人口由 1851 年的 33,000 多人，增至 1865 年的 12 万多人。香港亦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沿海的主要转口港。除了货物的转运外，香港亦成为华南中国人移居海外的中转站。从 1851 年至 1900 年期间，超过 200 万广东及福建人经香港移居海外，或被运往海地充当劳工。

1890 年代，南中国发生鼠疫。1894 年春，在广州传出超过 10 万人死亡的消息。同年五月，上环太平山街一带的中国人集中聚居的地区亦爆发爆发鼠疫，每天的死亡人数最多达100 人。结果当年之内共有 2,552 人死于瘟疫，为数约 10 万名的华人离开香港，贸易额亦一度大幅下降。之后 30 年之内，鼠疫仍偶尔在香港出现，1898 年至 1900 年期间，便再有 1,290 人死于鼠疫。

20 世纪初历史

踏入 20 世纪初，香港发展成为与南中国贸易的转口港。香港人口稳步增加，市区面积亦按此增大。1876 年香港人口 14 万人，至 1914 年已增至 50 万人。随着城市发展，香港一路增设各种现代市政建设，例如电车、火车、煤气、电力、电报等等设施一一在香港出现。而于 1912 年成立的香港大学，为香港培养技术人材。

1911 年以孙中山等人为首的群众推翻满清政府，中华民国成立，然而其局势一直动荡不安，使不少人逃难来香港。而民国政府对废除包括香港割让的不平等条约显得有心无力，更因

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未能藉《凡尔赛条约》收回德国控制的山东，使排外情绪更为高涨，并蔓延到香港，成为 1922 年海员大罢工及 1925 年至 1926 年省港大罢工的导火线之一。

1931 年起，随着大日本帝国占领中国东北三省，香港更开始面对日本的威胁，使英军考虑加强对香港的防卫。而当时全球经济大萧条及银本位货币制度受到冲击，都对香港经济构成一定影响。1937 年中国抗日战争正式爆发，除了使大量难民涌入香港，更代表日军的威胁更接近一步。

日治时期

香港在英国统治下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军占领时中断。

日本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即展开对中国的侵略。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并迅速攻占广州及邻近地区，之后南下至深圳河北岸，与英军为界。

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当天，即 1941 年香港当地时间 12 月 8 日 早上由酒井隆指挥从深圳进攻香港。负责防守香港的包括有英国、加拿大、印度士兵和香港义勇军。日军不单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在开战的首天便取得制空权。英 军和印军撤退到醉酒湾防线，然后撤出九龙半岛。英军和渡海后的日军继续激战。最终英军失去了唯一的水库。因此，港督杨慕琦于同年 12 月 25 日代表英国殖民地官员向当时总部设于九龙半岛酒店三楼的日军投降，从此揭开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

日军随即成立军政厅，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长官，直至矶谷廉介抵任首位管治香港的日本总督。日军在香港滥杀无辜，香港市民反日情绪高涨，有平民在香港岛的山头伏击日军将领。到了日军占领的中期，更有香港居民参与东江游击队，在新界等地方对抗日军。

日治时期，香港在经济、民生等方面皆受摧折。经济上，日军强迫香港市民以港币及法币（国民政府货币）兑换日本军票，到了战后所有的军票都不获承认而变成废 纸。战时与中国大

陆的贸易大幅下降，香港的经济陷入低谷。日本又在香港实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及强迫使用日文，香港的街道地区亦被改成日文。由于 食品及其他物资严重不足，加上日军在香港实行疏散政策，鼓励或强迫市民离开香港，战后香港的居民人数大减至60 万左右。

战后发展：经济转型

香港政府徽章(1959 年至 1997 年)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战胜利以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度在联合国上要求收回香港，但碍于当时国共内战已经开始，国民政府又没取得美国支持，无力向英国政府取回香港。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date=2007 年 8 月}}1950 年，英国承认位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继续承认撤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是苏联以后第一个承认新政权的欧美国家。

因国民政府在大陆之统治遭瓦解，数以万计的人从大陆逃到香港。香港人口由 1947 年的 180 万，增加至 1951 年的 220 万。新移民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更重要的是把技术和资金都带来香港。因中共政权推行锁国政策，不少外国公司把办事处从上海搬到香港。加上 1951 年爆发的韩战使联合国对中共政权实施禁运，香港原先依赖的转口港贸易不能维持。这些都为香港经济转型为工业为迅速发展创造条件，使香港摇身一变成为制造业中心，初时以纺织业为主，其后扩展至成衣、电子制品、钟表及印刷等。

国共两党的冲突也蔓延到香港。1956 年 10 月 10 日，右派工会策动大规模破坏活动，连日捣乱多家左派机构，暴徒并四出抢掠导致 300 人死伤，称“双十暴动”，港督葛量洪派遣军警搜捕暴徒才告平息。国民政府的情报人员从此被禁止进入香港。到了 1960 年代，随着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影响下，香港于 1967 年的一场劳资纠纷演化成暴动。香港街头被暴徒放满写上“同胞勿近”的真假土制炸弹，使香港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经济一片萧条。而深圳方面的红卫兵亦多次意图越过中港边境，并与沙头角的香港警察发生枪战。后来中共政府的总理周恩来，坚持不打算收回香港，这事件方逐渐平息。



暴动过后，港英政府意识到要改善民生，缓和社会矛盾。港督麦理浩在任内推行多项措施。最主要的是推行廉价出租公屋政策，使低下阶层逐渐由山边寮屋搬至公屋，改善生活环境。另外，麦理浩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打击政府内严重的贪污问题。政府亦推行"九年免费强迫教育"、大学生资助计划、廉价和优质医疗等，使 香港步入现代化城市之列。再加上经济迅速增长，香港与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四个地方并列"亚洲四小龙"。

1970 年代初期，由于新界土地契约的问题，使港英政府不得不考虑香港前途的问题。英国政府曾经多次要求向中国政府延续新界的租约，揭开了中英两国就香港主权移交问题达20 年争拗的序幕。

过渡期

随着中国大陆在 1979 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加上本地工资上升，香港的制造业逐渐北移。香港逐步转变为以商业及旅游为主的城市。香港在人均寿命、识字率及人均收入等各项社会经济指标皆拥有骄人成绩，足证香港在 20 世纪最后 40 年所获得的成就，但主权前途问题却亟待解决。

1980 年代初，新界租约将于十多年后届满，最初英国向中国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主权归中国，但英国人仍保留治权。不少香港传统上流社会的政治及商界 精英，开始时亦支持有关建议，但遭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否定。中国坚持英国对香港没有主权，只有治权；而且中国不单要收回新界，更认为把香港岛和九龙割让的 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必须整体收回香港；但承诺保障香港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权利。邓小平认为香港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社会 主义体制，立即融合对双方均无好处，故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办法，在收回主权的同时，容许香港拥有独立的经济及政治制度，即所谓"高度自治"。

1984 年 12 月 19 日，中英双方签订《中英联合声明》。根据这份声明，英国将在 1997 年 7 月 1 日把香港的主权归还中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上述协定中，中

国政府会“一国两制”政策，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在香港实行，并保证香港在除外交及国防外的各方面都拥有高度自治，直至 2047 年——是谓“五十年不变”。《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对中国共产党统治没信心的香港人纷纷移民欧美，带起第一浪香港移民潮。

在 1984 年至 1997 年之间，香港锐化成为全亚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香港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球排十名以内，但巨大的财富却未能掩盖香港人对未来政权更替的忧虑。1989 年北京发生六四事件，香港绝大部分人反对镇压，除了逾百万人大游行外，更曾罢工、罢市、罢课一天，其后更引发新一浪香港移民潮。为稳固民心，当时港督卫奕信提出香港机场核心计划。

1990 年 4 月 4 日，《香港基本法》正式通过，象征主权移交后的小宪法得到落实。1992 年 7 月，彭定康获委派为最后一位港督。由于六四事件后，民主进程一直备受港人关注，因此彭定康上任后，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改革，在香港立法会增加直选的议席，但北京当局认为彭定康的改革违反了《基本法》，港英政府跟北京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本文出自文汇网，原文链接：http://cq.wenweip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18）

【返回目录】

10-2 萧若元：港英时代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若没有公民授权为后盾，是无法有效管治的。这就是现在特区政府与以往港英政府所面对的社会的根本性分别。”

前文指出特区政府在现时的局限条件下，不可能作出有效管治。那么，从前的港英政府是怎样管治香港的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港英政府在先天上比特区政府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根据罗素的"权力论"，一个政府的统治，在最初的阶段靠的是赤裸裸的暴力，然后要靠的就是逐渐建立的威望，而港英政府的威望，在香港已累积了一百五十年。事实上，在港英政府统治香港的初期，她亦不停地遭受到反对，结果她透过各种方法逐一降服之后，香港人才大致被港英政府的威望所笼罩着。

在港英政府年代，有一次，当时的布政司霍德警告香港各界别要以为港英政府是没牙老虎，她有很多牙去咬人。 此话背后的意思，是他是会运用政府权力去对付那些与港英政府的敌人。大家亦深明他所说的并非虚言：很多知名人士与港英政府作对，下场正是坐牢。香港人深明此理，故此多年来甘于去当港英政府的顺民。

在一九八一年，我写过一部名为《女娲行动》的电视剧，这是香港史上的第一部讲政治阴谋的电视剧，也可能是史上唯一的一部，因为记忆当中，没见过第二部了。当我撰写剧本时，剧情牵涉到港督或港英政府，我是极小心处理的，因为那是没人敢触犯的禁区， 也没人敢在报章传媒严厉批评港督和英女皇。这种威望是特区政府所缺乏的。她是一个新政府，而且并非由

民选产生，而是假借北京而来，只是北京授权的威望。但很多香港人并不接受北京的威望。过去数十年，从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及至八九民运，中国发生的许多政治运动为人们带来了无数的政治创伤，因此香港有些人对北京抱有非常大的怀疑。即使现在中国经济起飞，但仍然不断传出社会丑闻，诸如毒奶粉事件等，亦使港人觉得中央政府虽然近年有所改善，但相比香港，仍然相差太远。

第二个政治环境的重大变化，是在彭定康的鼓励之下和在壹传媒的出现之后，香港传媒踏入了一个真正全面开放的时代。过去的媒体其实非常斯文克制，七十年代报章的娱乐版只占一版，但现在的花边八卦消息却天天占满十多个版面，而且发明了无孔不入的"狗仔队"。这生态环境造就了香港成为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而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若没有公民授权为后盾，是无法有效管治的。这就是现在特区政府与以往港英政府所面对的社会的根本性分别。社会一旦开放便不能回头，除非宣布戒严，大肆拘捕异己，否则无法回到未开放前的状态。

以前的港英政府是如何管治香港的呢？

以英国政府多年来统治无数个殖民地的经验，她得出这样的策略：首先，她迟迟不肯开放立法会选举，是为了令议员不需面对民意。如果立法局像现在一般，有部份议员是由民选产生，当议员变成要面对选票的一刻，他立即便会对政府造成极大的压力。

港英政府并非港督一人的统治，在他之下，有数以千计来自英国的高级官员协助管理，所用的整套公务员体系是由英国一手一脚训练出来，法律体系亦是由英国直接移植过来的。所以，管治香港的人员的意识形态与英国的执政者极度接近。因为整个制度均是由英国复制过来，远在英国的部门亦知道怎样去指导香港公务员执行工作。香港的公务员进升至某个层次，便需要到伦敦接受训练，就是为了要令香港的管治班子和伦敦的思维一元化，方能如愿指挥。

然后，她又会透过各种咨询委员会和立法会委任职位等方法，利用一班高等华人去进行与中下阶层联系及沟通的任务，使下情可以上达，再作出适当的让步。但很可惜，这一套的统治策略现时却是完全崩溃了。

北京政府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由于她本身的制度和香港之间有巨大的差异，因此无论用多少人力物力，亦不能指挥特区政府的操作。大家可以试想想，如果由人民银行行长指挥金管局，或由国家衞生部党组书记高强指挥卫生署，会发生何等情况？如果这是可能的话，北京就会支持高强而不是陈冯富珍出任世卫总干事了。

因此，我认为有效管治香港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有一个真正在本地产生的政党。这政党必须是在本地自然产生的，其党员所受的教育与公务员基础上相同，价值观亦相近，它与公务员之间才不至于产生极大的矛盾。再者，这个政党亦有足够的人数和政治向心力去指导、去驾御香港的公务员系统。同时，这个政党亦要透过普选去控制香港政府：只有这样，特区政府才有足够的威望去凌驾所有的既得利益者。但问题是，在过去十年和未来的数年，这个目标却似乎都未能做到。因为在这个问题上 的政治博弈，一直没办法就如何推进这个目标达成共识。

（萧若元，香港传媒工作者。原文链接：http://hkfate.blogspot.hk/2008/10/blog-post_3647.html）

【返回目录】

10-3 徐梓杰：那年，一九六七

“时代过去，‘六七暴动’在港人心中渐被淡忘。但随着‘六七’四十五周年，加上今年香港举行特首选举，左派活动对香港社会的影响、地下党等议题被再度炒热。‘六七暴动’的定性如何，特区政府会否为当年一些被误判的‘暴动犯’平反，相信经历过‘六七’洗礼的老一辈，仍会关注。”

四十五年前的四月，人造胶花厂爆发劳资纠纷工潮，拉开了“六七暴动”的战幔。“打倒港英、战无不胜”的口号、一场又一场的流血冲突、“花园道事件”、真假菠萝恐慌、林彬事件……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为香港社会带来动荡。适逢“六七暴动”四十五周年，本刊记者专访三名亲历“六七暴动”的人，娓娓道来当年的经历。

由五月风暴说起……

一九六七年四月，新蒲岗人造胶花厂爆发劳资纠纷。当时，工厂颁布了极为严苛的规定，包括损坏生产机器的工人不会获发工资、厂方不允许工人请假等。劳资双方谈判不果，厂方更在四月二十八日以“生意收缩”为由解僱九十二名包括劳方代表的工人，并关闭分厂的啤机部，掀起工人连串上街行动。当时的港英政府派出防暴队 控制形势，事件最终流血收场。为了声援数十名被工厂辞退的工人，工会于五月开始介入事件，组织港九各工会，成立“港九各业工人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 会”(简称:斗委会)，把港英的镇压定为“反华事件”。

随着“斗委会”成立，工会等左派人士参与连日示威，抗议港英政府以暴力镇压。事件的性质亦由最初的劳资纷争，改变成“反英反帝殖主义运动”，六七年的香港街头，就此风起云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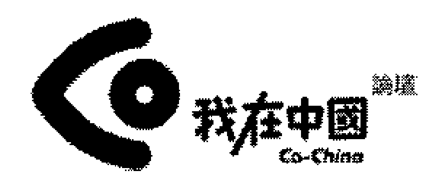
“花园道事件”



中区是港英政府的根据地，示威浪潮亦顺势由九龙蔓延至港岛。五月二十二日早上十时许，数千名由左派机构派出的代表聚集于中环花园道，准备前往港督府游行抗议。游行队伍行经花园道口希尔顿酒店（现址为长江中心）时，被早在那里布防的数百名防暴队阻截，禁止他们继续前进，并命令他们折返。游行人士与防暴队僵持 不下，防暴队不予放行，并挥动警棍殴打示威群众。

于“花园道事件”中被判入狱的《经济导报》记者许云程忆述，当天，他受上级委派到花园道采访示威，刚抵达花园道，随即看到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于是立刻举起手上的相机准备拍摄：“防暴警察一棍扑下来，我拿出记者证，并对他说,“我是记者！“防暴警察看毕他的记者证：“再扑多一棍，指左派记者更加要打！”许云程随即晕倒，醒来发觉自己头破血流，与其他示威者被警方押至酒店墙边，带上手扣。许云程欲提出抗议，一名警官再以警棍击向他的头部，他第二次晕倒，其后被送往玛丽医院羁留病房。翌日早上，他醒来发觉视力模糊，伤势十分严重：“脸上缝上三针，头顶缝上三针，鼻梁缝上一针，还有膊头肩骨爆裂，身体及手臂一片瘀黑，血流满整件恤衫。”

数天后，许云程身穿血衣被带到法庭，先被控以“非法集会罪”，后改以较严重的“暴动集会罪”判入狱两年。他指出，当年的审讯极不公平，所谓证人都是 防暴警察，指控他打警察：“不论三七二十一，捉到人就判罪”。许忆述当年有约四百多名囚犯，当中约一半是“六七”政治犯，更有十多人是记者。



“斗委会”相继成立

许云程以及一众左派人士于六七年六月被判入狱，但“六七暴动”并未因“花园道事件”而结束，流血镇压反而令左派人士行动升温，加上一九六七年国内正值文化大革命，“一片红”的气氛在香港社会变得更为炽热。

自称前中共香港地下党员的梁慕娴，最近出书《我与香港地下党》，于六七年时任学友社主席。她指出，当年中共香港地下党领导着“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 (简称学友社)组织学界参与政治运动，更于六七年五、六月开始在学校相继成立“斗委会”，向学生宣传反英思想。她对于学友社当年以学术社团形式，暗地向学界社员灌输爱国思想感到难过，她表示：“六七最大的受害者是参与运动的年轻人，运动失败后，他们失去前途和生活。”她形容，这班年轻人都是一群年青、单纯的学生，满腔热情地参加斗委会，相信自己是参加了一场正义的斗争。为此，他们付出了学业上、事业上和健康上的高昂代价。

号召学生 半罢课上街集会

学友社当年经常举办一些声讨大会或追悼会，希望透过提出“粉碎奴化教育” 的口号，向学生灌输“香港就要解放”的信息。另一方面，梁透过学友社的学生社员，于各校成立“斗委会”，强调坚持革命，并发动学生进行“半罢课”：学生上 课时在校内派发传单及悬挂大字报与横额，晚上则到社址创作口号、制作传单及组织集会安排。六七年暑假期间，梁更带领社员及学生上街进行“飞行集会”（类似 现时的快闪党），要求学生在指定时间走出马路展示横额及中国国旗。最终，有不少学生因而被捕，甚至判处监禁。



最动荡时刻 “菠萝”满地

六七年八月，左派人士发动的政治运动更趋激烈，港九各街头出现“真假菠萝”土制炸弹，港英政府实施戒严，引致人心惶惶。八月中旬，北角清华街有两名小童被“真菠萝”炸死。资深传媒人岑倚兰当年住在北角清华街，这两名小童，正是她儿时的玩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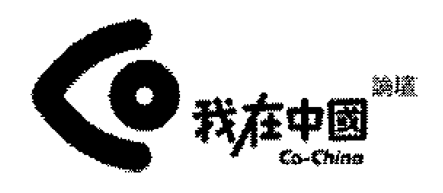
“那个年代我只是小孩，但脑里对清华街仍有深刻印象。当时家境较穷，小孩在家没事干，便在街上到处玩。六七那年，我们仍不知什么是暴动，只记得经常停课，又或是上课期间老师会突然大叫‘走啦！’，我们便会走到清华街通处玩。老师告诉我们要小心街边“菠萝”，又会说政府实施“戒严”。年纪小，当时只会 天真地以为是吃得的菠萝和盐。”虽然年少无知，但岑倚兰说小孩最紧要认识“同胞勿近”四字，因为街边常写有“同胞勿近”的“菠萝”，目的是炸死不懂汉字的洋人。

据岑倚兰忆述，事发那天该对年轻姊弟在清华街一旁，打开一个内里装有真炸弹的巧克力盒，炸弹随即爆炸，把二人炸死。“事件传开后全街震惊，个个鸡飞狗走，不敢再在街上流连。第二日我放学回家，家人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搬走。”岑倚兰形容，当年社会的气氛是非常紧张，市民活在惶恐之中。

林彬事件　震惊全港

爆炸后数天，更发生林彬被活生生烧死事件，成为“六七暴动”中最震撼全港的一幕。林彬是香港商业电台的播音员，他于电台节目中抨击左派人士，讽刺当时左派阵营中几位积极发动暴乱份子，指他们扰乱香港秩序。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林彬开车返回电台，途中被两名伪装成修路工人的暴徒拦截，暴徒向林彬的车泼上汽油纵火，在车内的林彬被活活烧死。



事后，中共香港地下党被指是派人杀害林彬的"凶手"，令"左派"声名狼藉。同年十二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令，中共香港地下党及左派停止一切行动，"六七暴动"才告平息。

参与六七"无怨无悔" 一生痛恨港英帝国主义

回望六七年的牢狱生涯，许云程明言"无怨无悔"。他认为自己当年在"六七暴动"中尽力做好记者本分，"对得住良心，并没有犯罪"，他是受到港英政府的迫害。他又谓对参与"六七事件"感到光荣，在扣减假期后，他在六八年底刑满出狱。当时其所属报社特意派员到监狱接他，并让他继续在报社工作，直至退休。 香港九七回归后，百多名曾因六七暴动坐牢的人更组成"六七动力研究社"，不时举办春节团拜及同贺国庆等聚会。

经历四十五年风雨，许云程表示："当年（六七年）死不去，现在已没有甚么可怕"，但一直令他未能释怀的是曾经因六七坐牢的人，一生仍需背负暴动犯的 罪名，就连子女考公务员亦受到阻挠。他不认同以"暴动"两个字来总括一九六七年前后的事件。他认为，当年左派人士和群众所进行的是一场反英抗暴斗争，首先使用暴力的是港英政府，他们才反抗，一切行动是出于同胞爱国团结之心。四十五年过去，如今他只期望有朝一日特区政府能够为他们撤销暴动犯这个"不合理"的案底，还他们一个清白。

梁慕娴退党觉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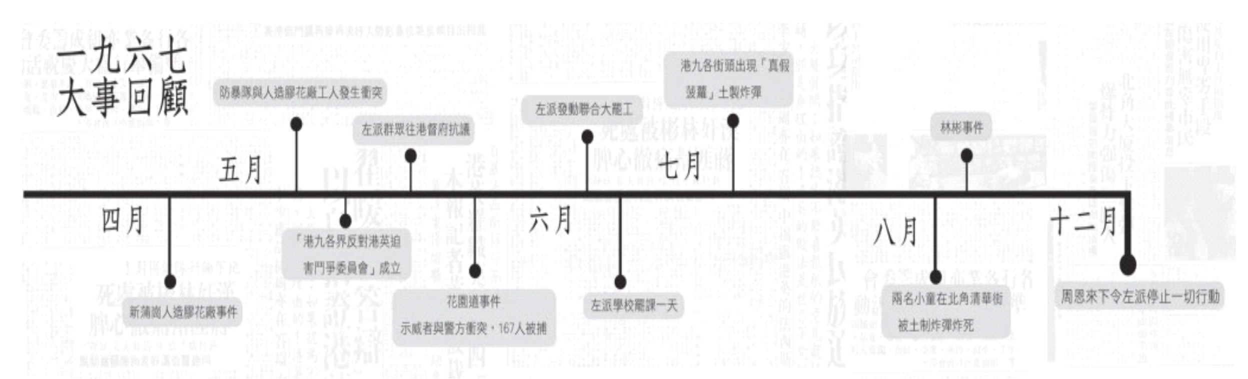
一九七四年，梁慕娴移居加拿大，决定退出中共香港地下党。她指，经过二十多年的觉悟，她自省："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对所有事都视为理所当然， 即使林彬被活生生烧死，我仍无甚感觉。直到觉悟后，我才发觉自己中了'阶级感情死亡毒'，人的死亡我也用阶级来分辨感受，这绝对需要反思"。



当年梁慕娴以学友社主席身分鼓动学生成立“斗委会”，她感到自己令到不少有学识、有良好家庭背景的学生失去前途。他们最后有人被捕坐牢，亦有人遭学校开除，往后的路曲折坎坷。对此，她不能释怀。

受访期间，梁慕娴两次感触落泪，鸣咽道出：“后来好多人的生活好惨，有些人讨厌我，不愿意跟我见面。”不过她表示，仍有一些学生专程到温哥华探望她：“这些学生有家庭，有生活，他们甚至跟我说，对于六七的过去不会后悔，以前的事可锻鍊人生，但我不信。其实我心知，他们是安慰我才这样说。”

时代过去，“六七暴动”在港人心中渐被淡忘。但随着“六七”四十五周年，加上今年香港举行特首选举，左派活动对香港社会的影响、地下党等议题被再度炒热。“六七暴动”的定性如何，特区政府会否为当年一些被误判的“暴动犯”平反，相信经历过“六七”洗礼的老一辈，仍会关注。



（徐梓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实习刊物《大学线》记者，原文刊于《大学线》第 106 期。原文链接：http://ubeat.com.cuhk.edu.hk/?p=5079）

【返回目录】

【人】

10-4 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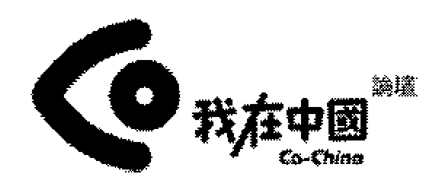


“爱国和民主都是香港这场实验早该完成却未完成的部份，是自利的我这一代人迟迟交不出来的功课。”

我是上世纪 52 年在上海出生的，四岁到香港，小时候上学，祖籍栏填的是浙江鄞县，即宁波。我在家里跟父母说上海话其实是宁波话，跟佣人说番禺腔粤语，到上幼稚园则学到香港粤语。我把香港粤语当作母语，因为最流利，而且自信的认为发音是百分百准的， 如果不准是别人不准，不是我不准。就这样，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解决了。

我后来才知道，我是属于香港的“婴儿潮”，指的是 1949 年后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战结束那年是五十万，到 1953 年已达两百五十万，光 1949 年增加了近八十万人。随后十来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像旧式的可乐瓶一样，开始还是窄窄的，后来就膨胀了。

可想我这代很多人对童年时期的贫穷还有些记忆，家长和家庭的目标，印在我们脑子里的，似乎就是勤俭，安定下来，改善生活，赚钱，赚钱，赚钱。



我们的上一代当然也有一直在香港的，但很大的一群是来自广东的、来自上海和大陆其他地方的，是在认同大陆某个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来的。

南来的知识份子更有一种文化上的国族想象，逃至殖民边城，不免有“花果飘零”之叹。

然而，从我这代开始，变了，就是，中国大陆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带点恐怖、大致上受隔离的陌生邻区，而我们也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没有每天仇大苦深想著香港是个殖民地，我们只是平凡的长大著，把香港看作一个城市，我们的城市。

这里我得及时声明我是在发表对同代人的个人意见，并不是代表同代人说话，说不定有人一生出来就懂得爱国反殖。我在下文想说明的其中一点恰恰就是爱国和民主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是后天慢慢建构出来的。

我们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不介绍中国二十世纪当代史的。尽管中文报纸上有报导大陆的消息，我这代在成长期往往在意识中是把当代中国大致排斥掉的。

我这代一个最大的共同平台，就是我们的中小学，不管是政府还是教会或私人办的。唯一例外是“左派”学校的学生，在人数上是极少数。

我们的学校当时是怎样的学校呢？是一条以考试为目标的生产线。我们这代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考完试后就会把学过的内容给丢了，这对香港整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可以很快很聪明地学很多东西，但转变也很快，过后即丢，而且学什么、做什么是无所谓的，只要按游戏规则，把分数拿到。

在中学里面，我觉得唯一不全是为了考试的学科，除了教会学校的圣经课，就是中文中史课。我们的中文老师可能也是我们唯一接触到中国大传统的渠道，关于中国文化，甚至做人德行，都可能是从中文课上获得的。现在我这代中人，对文化历史时政有些理想主义想法的人，很可能都是中文课的好学生，或读过武侠小说，否则说不定连小小的种子都没有了。

可惜中文课在香港英文学校里是比较边缘的东西，有些根本就不理这门课。

1964 年，我这代进入青春期，那年，披头士乐队访问香港。

我那比我大一岁的姊姊和同班同学去电影院看了十次披头士的电影"一夜狂欢"。我们跟父母搞了些代沟，稍留长了头发，穿牛仔裤，弹吉他。因为我们曾手拉手唱过英语反战歌，我以为不用问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参与性的民主，我要到了 1980 年代中才觉悟到没有必然关连。

1973 年，香港股市在狂升后出现"股灾"。

我这代的青春期，就由英美时髦文化开始，到全民上了投资一课后毕业。与同期同代大陆人太不一样，我们可说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代。

当然，中间经过 1966 和 1967 的两次街头抗争插曲。第一次带头反天星小轮加价的是青年人， 对未成年的我们有点不甚了了的轻微吸引。第二次冲突大多了，是文革的溢界，逼著站在港英一边的明智大多数和他们的子女，随后的许多年对中国大陆更有戒心——把大陆视为他者，相对于"我们"香港。除此外，以我观察，六七年事件对我这代大多数人的心灵和知识结构并没有留下显著痕迹。

这时候登场的是香港随后三十年的基调：繁荣与安定压倒一切。这时候香港政府调整了管治手法，建公屋，倡廉政。这时候我这一代也陆续进入人力市场。连人口结构都偏帮我这一代：我们前面没人。就是说，婴儿潮一代进入香港社会做事时，在许多膨胀中和冒升中的行业，他们往往是第一批受好教育的华人员工，直接领导是外国人或资本家。我们不愁找不到工作，我们晋升特别快，许多低下层家庭出身的子女凭教育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社会阶层，我们之中不乏人 30 来岁就当外企第二把手。

似乎不论家庭或学校、文化或社会，都恰好替我一代做了这样的经济导向的准备，去迎接随后四分一世纪的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期。

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运气好到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著我们。香港是最早进入二战后建立的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地区，在日本之后便轮到我们了，比台湾早，台湾还搞了一阵进口替代，我们一进就进去了，转口、贸易、轻工业加工代工，享尽了二战后长繁荣周期的先进者的便宜。另外，大陆的锁国（却没有停止以低廉货物如副食品供给香港）也为我们带来意外的好处，这一切加起来，换来

香港当时的优势。我这批人开始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多灵活、多有才华了。我们不管哪个行业都是很快就学会了，赚到了，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又转去做更赚钱的。

我并不是说我们不曾用了力气，我想强调的是：这一代是名符其实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要负上绝大责任。

我们是受过教育的一代，可训练性高，能做点事，讲点工作伦理，掌握了某些专业的局部游戏规则，比周边地区先富裕起来，却以为自己特别能干。

我们从小知道用最小的投资得最优化的回报，而回报的量化，在学校是分数，在社会是钱。这成了我们的习性。

在出道的 1970 和 1980 年代，我们在经济上尝到甜头，这成了路径依赖，导致我们的赚钱板斧、知识结构、国际观都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还以为自己见多识广。

我们整个成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么一种教育：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 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擅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

我在香港拍过一部美国电影，美国的设计师要做一个布景台子，叫香港的道具师帮他做，他每天来问做好没有，香港道具师都回答他，不要紧，到时一定会做好的，等到开拍那天，果然那张台子及时被搬进来了，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不错，但仔细一看，台子的后面是没有油的，因为后面是拍不到的，而且只能放着不能碰，一碰就塌，，美国的道具师不明白，为什么我早就请你们做个台子，要到最后一刻才交货，并只有前没后；香港的道具师也装不明白，你要我们做个道具，不是及时交货了吗，而且是几秒钟镜头一晃就过去的那种，为什么要做得太全呢，在镜头里看效果是不错的，况且不收货的话也没时间改了。这是我们的CANDO 精神、港式精明和效率。



我这代这种心理，早在成长期就有了，到我们出道后更是主流价值，不是现在年轻人才这样，现在年轻人都是我们这代教出来的。说 1970 年代是“火红的年代”、我这代是理想主义一代，喂，老鬼们，不要自我陶醉了。

正如太多我这代人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比不上我们的上一代，只是运气比较好。同样，火红的一代也只是后来膨胀了的神话，严格来说，都是失败者。

首先，火红并不是我那代的主流特质，实际参与的人就算在大学里也只是很小的一群：我在 1971 年进香港大学，在我所住的宿舍里前后三年百多名宿生中，我知道的参加过“保卫钓鱼台”运动最大一次示威的才只有 3 个——有个别的宿舍比例确是较高。

当时大学生的左翼小圈子里有两派，一个是毛派，也叫“国粹派”；另外是更小的圈，是左派中对当时的毛和文革有批判的一派，叫“社会派”。在大学外，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几堆跟当时仅存的港澳老托派联络上的年轻激进派，这些圈子也很小，虽然戏剧效果较大。教育、教会和后起的社工界、法律界、新闻界也有个别关心公义的人士和组织。像我这样松散参加过校园民主、民生（反加价、反贪污）、民族（中文成法 定语文、保钓）等活动的人则稍多一点。港澳工委在香港的有组织“左派”（不包括亲北京工会会员）人数当然又多一点。但总的来说在主流社会里是少数，说起来远不如 1989 年、2003 年上街人数——那才是火红的年份。

待四人帮倒台，不少毛派学生马上进入商界，到美国银行等商业机构做事，一点障碍都没有。1979 年改革开放后，他们又是第一批去大陆做生意的人。到底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英。

可以看到，毛派的深层执著不是毛主义，而是国族，可提炼出来给今天的是爱国。其他零星异端左派当年的主张也幸好没有实现，然而他们的基本关注是公义，可滋养今天的民主诉求。这就是火红一代的遗产。

火红年代的影响很有限，所以在 1980 年代，民主和爱国都未竟全功。如果婴儿潮一代人当时空群而出要求民主如 2003 年的五十万人上街，基本法都怕要改写，事实是大部份我这代经济动物根本没有去争取，而少数已成既得利益的同代人，竟有反对普选等普世价值的。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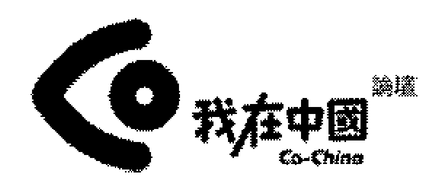
时，我这代人仍普遍保留了之前对大陆的畏和疑，而 1989 年的天安门镇压更严重拖慢了港人学习爱国的进程。

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作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特点：1980 至 1990 年代中出现往加拿大和澳洲的移民潮。对部份南来的老一代是再出走，对婴儿潮一代是留学以外第一次有规模的离散，大部份是因为九七要回归而移民，故不是经济移民，而是替家庭 买一份政治风险保险。有部份的家庭，将太太和子女送去彼邦，丈夫仍在港工作，成“太空人”，因为香港的工作更能赚钱，兼想要两个世界的最好。真正断了香港后路者，他们的位置也很快为留港的原下属补上。许多成年人移民后的香港身份认同并没有动摇，身在彼邦心在港。对我这代来说，在亚洲金融风暴前，从财富和机 会成本计算上，移民加澳应属失利。眼见香港持续发达和大陆的变化，九七前后回流香港的也不少。当然也有决心溶入彼邦，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总的 来说，移民潮势头虽强，最终只是移民个人和彼邦的新经验，过后竟没有在香港留下重大烙印，没有妨碍过去二十年香港主流的发展，而九七效应更曾一度加强这主流：赚快钱。

一直以来，就香港大学来说，主流所向往的，除了当医生外，是在香港政府里当官。文官有两种，政 务官和行政官，都要大学资格；而那些所谓最精英的政务官，他们的英语要好，大概头脑也要比较灵，这类官员总处于职位变动中，今年可能管经济，明年说不定派 去搞工务，换来换去，当久了自以为什么都懂，其实是按既定规章制度程式办事，换句话说只懂当官僚。说到底，他（她）们也只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英，我们又如 何能对他们有著他们认知程度以上的期待？

到 1970 年代中，主流精英除了各种专业如律师、建筑师、工程师、会计师、教师外，还多了一种选择：进入商界，特别是外企。1973 年港大社会科学院应届毕业生就有几十人同被数家美资银行招揽。我们走进了香港的盛世——婴儿潮代的镀金年代。

我们带著这样的教育和价值观，自然很适合去企业打工，却同时想去创业和投机。我这代开始了香港 人这种奇妙弹性组合。我们当管理人，不像西方和日本上世纪中想象的那套刻板的白领中产组织人，而是十分机动的。我们自以为有专业精神懂得依游戏规则办事， 但如果能过关也随时可以不守规。我们好学习，甚至加班拚博，不太是为了忠诚完美，而是为表现加薪，



或说有上进心。我们随时转工易主换业。我们是不错的企业管理人，却同时在外面跟朋友搞生意。

我这代人到底是在相对安稳的社会长大的，不算很坏，我们有做慈善的习俗（当然是在保持安全距离 的情况下捐点余钱），在不影响正业的情况下愿意做点公务（尤其当公务直接间接有助正业），表现出大致上守信（理解到这种社会资本长远来说减轻自己的交易成本），也会照顾家人亲友（扩大版的家庭功利主义），不过，底子里是比较自利和计算的，如以前在学校考试，最终是自己得分过关。是的，我们爱钱。

所以出道十年八年后，我们想象力就被绑架了，很甘心的受勾引，从赚辛苦钱，进化到想同时赚更多更容易的钱：股票、地产、财技。我们初是羡慕，后是不安份，怀疑自己的赚钱能力比同代其他人落后了，最终一起陷入了一个向地产股票倾斜的局。而那几个行 业，从 1970 年代初开始，一直节节上升，只有在 1974、1984、1987、1989、1995 等年，有个短暂股灾或楼价回落什么的，很快又更猛的往 上冲。至此，我这代有了这样的全民共识：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因为今天确比昨天好；楼价是不会跌只会升的，打一生工赚的还不如买一个单位的楼。谁能不相 信呢？我们的上半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来的。至此我们整代的精英都强化了本来已有的投机习性，一心想发容易财。

我的牙医边替我整牙边打电话问股票价。多少做工业的人把工业停掉，用厂地让自己转项去做房产，我们的偶像改成地产商或做股票玩财技的人，而我这代很多人搭上了顺风车而确实得利。

1980 年代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列根戴卓尔年代，这学说背后的意识形态很符合我这代人的个人发财愿望，我们知道了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政府好心做坏事、产权不清出现公地的悲剧、寻租行为增加交易成本等启迪民智的观念。公司化、解规管渐成政策。资本市场进入更多人的意识。我屡次在聚会上听到黑社会大佬在谈 PE（市盈率）、IPO（首次公众认股）。好像是天赐给我这代香港人一个方便法门，原来自利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不过，当学说变成信仰咒语后，就出现外部效应，不利于社会进阶和凝聚。1980 年代我们的一些作为，决定了今日香港的局面。不用多说的是中英联合声明、一国两制、基本法，这些 1980 年代开始订下的规范性的纲领。

1980 年代大陆开放，我们的工业就搬到珠三角去了，谁都不能用工业空洞化的理由劝别人留港， 或提出什么工业政策。既然是赚钱机会嘛，那就去吧，本来已经有点到头的轻工业，也不用烦升级再投资，那些陈旧的设备都被运进大陆，找到廉价的劳动力，重赚了一笔，并即时利及香港。工厂搬走（像当初上海人南来开纺织厂的用地），正好改做房地产。可这样一来，整个香港在 1980 年代开始等于是自动放弃了制造 业。

1983 年的 9 月，因为中英谈判的前途未卜，港元对美金的汇率变成一比九块五毛五，人心惶惶，香港政府断然放弃港币自由浮动，改跟美金挂勾，当时也是非常有效的决策：民心很快被稳定了下来，外资也安心，知道他们投进香港的热钱随时可以定价换回美金。

可是也因此香港政府只得放弃了自主的货币政策，从此跟着经济体质差异很大的美国走，这个 1980 年代的决定一直绑住了香港调控通胀通缩的一只手，几任政府都不敢解套。

举个著名案例，在九七回归前，那时美国恰恰因为墨西哥危机，在减利息，减得非常低，香港只能跟着把利息降得非常低，但香港当时的房地产是过热的（投机者期待回归效应、大陆很多单位希望在香港开个“窗口公司”等等原因），应提利率才是，却变了降息火上加油。

后果是把已经是泡沫的房价再往高吹，毁了香港的价格竞争力，诱导了我这代中产者高价入市后变负资产。

香港 1980 年代以来关键都在房地产。中英协定规定每年限量批地 50 顷，这方面政府是赤裸裸干 预市场而不是放任。1984 年至 1997 年六月，楼价升了 14 倍，推到一个和港人收入远不相称的地步，把全民财富集中在不神圣的三位一体（房产、地产股和 按贷银行），进一步鼓动了港人走精面赚快钱，增加了政府收入，扭曲了政府决策。

世界上比较上路的政府，很少故意搞地产过热，玄妙的是香港历任政府竟甘于汇同发展商和银行扮演 地产热钱化的主谋共犯，而沾沾自喜的我这代有恒产者岂能不成从犯？香港用于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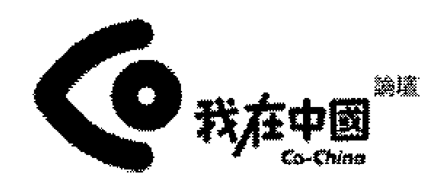


市建设的土地少于 20%，英国殖民者留了超过 80%给山和树，香港的土地真的 不足吗，还是利用这个迷思来政策性的逐步把地价推高？（答案：后者。）1997 那年，香港卖地收入占政府总收入 23%，还未算印花税。反讽的是，一半人口 住的公屋，加上公共设施、公立医院，公费教育和公务员，不靠卖地和房税征来的钱，我们又怎能享有这么窄的税基交那么少的所得税和利得税？

这就是香港经济的移形换影大法：香港政府既似是积极不干预的放任小政府，又是对社会能力强势投入的大政府，像是有两个回异的经济学家——弗利民和阿玛塔耶森——同时在指导香港经济，而从制度政策看，看到的却是一只依重地产并以干预来偏护地产金融财团的有形的手。一切美好，全靠地产，直到它变了怪兽。

这个举世无双的香港本色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不知道是天才的剧本，还是自然浑成：土地是皇家的， 政府做庄家，以限量供地造成稀有令房价长期上扬，吸引香港人纷纷问银行贷款买房，世代相传了地产必升的神话，港人有余钱就继续买房，或投在当时七大地产公 司主导的股市，让有恒产者与地产商、股市、银行利益与共，至于买不起恒产的人，政府建公屋低价让大家住，同时靠卖地增政府收入，保持低平窄税，法治开放， 联系汇率，繁荣安定，进一步吸引全世界包括中国的直接投资、避难逃资、投机热钱涌入香港，房价股市越发猛升，大家发财，顺便造就了我城几十年的富贵与浮 华、我这一代人的灿烂与飞扬，思之令人感伤，然后不禁哑然失笑，简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天仙局，谁还理会制造业空洞化、资源投在非生产性的建设、竞争力消 失、房价比新加坡高三倍、大陆在改变、地缘优势在磨灭、热钱靠不住？突然日转星移，好日子不再。场面撑久了，我这代人没见过别的世面，还以为这就是本该如 此的永恒。一个亚洲金融风暴，问题都出来了，可是已积重难返。

今天香港的问题，都和 1997 前我们自已设的套有关。譬如，我们的基本法里，规定公务员的薪水不能低于九七前，就算经济不景，他们的薪水也不能大调，以此来保护当时公务员的信心。又譬如，我们自以为平衡的预算很重要，故在基本法里对此有期待。这点让董建华担心，从 1998 年到现在，香港每年都有赤字。



有些人说董建华上台后改掉了许多东西，其实现在香港更多是九七前的继承，而不是九七的决裂：并不是说英国人走了，我们不用他们的政策，不受他们的影响了。重大的局面都是九七之前已经布好，而不是九七后才有的，我们只是把九七前的问题更劣质化更外露罢了。

我们的公务员以前听命于英国外交部和女皇任命的殖民长官，现在也是采取和上面完全一致的态度，他们无所谓，只要老板叫他们做什么，他们把它做好就是了，现在做事是没以前轻松了，但他们除了自保自惠外是不担当的，敢为老板在外面说几句话护主，就叫很有胆色了。

董建华政府的认受性来自北京和财团主导的一小撮人，自然向北京治港官僚及财团倾斜，现在香港高 级的官员，我同代的聪明人，也就不会去挡住北京治港官僚及财团对政府的暗箱操作。不过财团和主权国官僚的影响向来很大，1997 后只是延续，倒是特区行政长官的自主性似更弱于受命伦敦的港督，遂恶化了"打笼通资本主义"的局。

1997 年的香港是非常繁荣的，给了好的开始，财团和官僚结合的新政府以为自己掌握到过去香港成功的要素，很懂香港，非常自信，其实他们由工商专业从政，或由官僚扮政治人，对香港的认识是局部的、选择性的、甚至自我误导的。

本来，回归后的政治安排有点像中国当代史上名声不好的训政，不过训政也是一个机会，大权在握，是可以趁头几年解决一些香港固有问题及部署应对外部剧变，可惜董建华运气和能力俱不好，无法用上训政给他的机缘。

现在看起来，从外部来说，大陆的改革开放，初则对香港有利，再下来既一定有互补互利的双赢情 况，甚至是大陆领着香港飞的共荣，但也会让香港体验到"让你的邻居做乞丐"这句话，地区与地区间的激烈竞争是必然的，究竟，香港以前的独占性的地缘优势是 没有了。所以说外部的情况是喜忧参杂的。

从内部来说，香港很殊胜，税低，效率高，法治尚存，廉政未泯，言论还自由。我自己去了大陆台湾 后也有这个感觉：在香港办事多方便！我们没有别的社会的城乡、族群、宗教等重大冲突。当然，这些内部的优势也是 1997 前就已经有的，甚至可说是我这代出道前已铺垫

的——其中廉政是成就在我这代的。我一代人的问题是太自满于自己的优点却看不到内部的盲点，更落后于急剧变化的外部形势。

我相信香港不会像扬州、威尼斯般，由区域枢钮都会一落千丈只剩下旅游。不过看到英美一些工业城市一衰落就是几十年，也有可能香港转型需要漫长的一段时间。

我知道还是有人以为政府少说话少计划，香港经济就自然会好，这是我这代既得利益者的一厢情愿。2004 年市道转旺，大家憋了很久，期待重温旧梦。可惜时代不一样，一个更严峻的变局已成形，我们不可能回到往日——何况以前香港政府也从来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不干预。

往前走，我们要解掉一些 1980 年代以来自已设的套。我们要来一个"边缘向主流的反扑"。爱 国和民主就是必须并肩变为主流现实的两个边缘价值，缺一不可，否则既有宪政危机，也改不了打笼通资本主义的决策腐败、政府自主性旁落、财富两极化——香港 的财富差距越拉越开，坚尼系数竟由 1971 年的 0.430 升至 2001 年的 0.525，属最糟糕的发达国家之一.

爱国和民主都是香港这场实验早该完成却未完成的部份，是自利的我这一代人迟迟交不出来的功课。

我们 1980 年代开始过份重视地产和金融，连政府的思维都像地产发展商，而把原有的贸易、工业 冷落了。现在，我们不应只膜拜对香港生产力和竞争力最没贡献的地产商和被过誉的资本市场财技人，应重新推崇有国际或地区视野的贸易商、工业家、物流界、基 建发展商和创意业，及实干赚辛苦钱的其他产业如零售业和部份不受利润保护的公共设施业。我们需要更多样化的产业类型。

政府现在说香港以金融、物流、旅游、工商业为主，仍不突显工业。但我这代人所未遇上过的结构性 失业，终于出现。失业打击了我这代部份的人，而将持续困扰下一代。这是外部环境转变和产业偏食的后果，只鼓吹金融和服务业，很明显不能提供足够就业机会。 高失业是很伤害社会凝聚的，有经济学家就提出"二元经济"，一方面，我们还要继续鼓励金融这类"高价值、低就业"行业，但从另一元来说，我们也要开发 那些"低价值、高就业"的产业，包括所谓本

地经济，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会缺少就业机会。“二元经济”原指某些大面积地区内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并存的经 济。在全球化下的全球城市，则倾向出现收入二元分化的趋势，一元是高收入职业，一元是低价值服务业，像速食店职员、清洁工、小贩、迪斯尼主题园的服务员等。

二元经济的说法很正确的指出维持就业不能只靠金融服务和大企业，但我们要注意“低价值、高就业”这样的思维语境里的“认命”倾向，小心反过来合理化了已经严重的两极化趋势，并衍生出二元分割的路径依赖。

我这代很多人是穷出身然后翻身到富裕，现在若把就业者锁在两个世界，扼杀了往上流通的机会，等于正式宣告了下一代人的香港梦——水涨船高大家明天都更好——的幻灭。这将是香港的倒退

我觉得，香港必须也有条件去倡导二元经济的一个更进取的规范性目标，就是“中价值、中就业”，这样大多数下一代才会有寄望。

我们要鼓励制造业、贸易和与制造业配套的服务业，找回 80 年代给我这代人弄丢了的出口导向制造 业创业观，如果不是那样，以后香港凭什么来做珠三角的前店呢？人家为什么要把物流给我们呢？香港完全不参与某些工序的研发生产升级，不深入珠三角生产链， 最后我们连物流也沾不到。我们不能总是厚著脸，求中央政府扭住广东省的脖子让利给其实更富裕的香港。

香港并非一无所有之地，我们有多年的累积底蕴，重做制造业、贸易和配套服务的产业不是不可行，有很多榜样可以学，义大利北部的工业是由无数工作坊式的小工厂组成的，绝对是中价值、中就业。（不过义大利的重家族不重法的作风则不值恭维。）

我在上文说过我这代人的国际观其实是有局限的，其中一种局限是参照物件太窄。美国故然不能忽 略，但更适合为香港整体参照的有新加坡、台湾和韩国，有社会成就高的丹麦、比利时、荷兰等欧洲小国。荷兰环水地小人稠（是香港人口两倍多一点），是全球第 6 大对外投资国和出口国（跟香港相似），产业比香港均冲多元，以贸易和物流著称，强盛的制造业则传统和高科技俱重，大公司和工作坊并列，既有国际名牌，兼 发展金融旅游原料通讯，连渔农业

（含花业）也蓬勃，城市化程度高，失业率在西欧是偏低的，财富分布相对均衡，它的政府、资本与劳工的协商民主政治，也值得 参考，通过协商减政府预算、限劳工工资，是后福利主义第三条路的典范。近年全球经济不景，荷兰免不了，偏右政府上台，继续砍政府预算，减公务员工资人数。

当然，香港最重要是认识自己，弄清楚自己的各种能力，新的发展是要"附加"在现有资源和经验上的，要"趁势"，要"扎堆"，要"透孔"给多点人参与，我称之为"香港作为方法"。

这里，政府除了改善基建、教育和促进交流外没有太大的参与空间，首应做一件事：减税，给愿意做制造业者一点税务优惠，以诱创业者回来香港，并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象征资讯：香港政府的优先次序和作风已调整了。在减税这点我相信连香港的弗利民追随者也不会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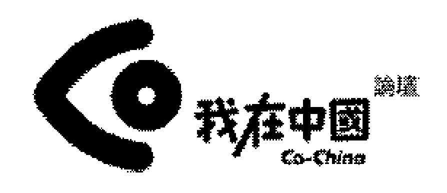
还有，现在空置的厂房和写字楼，让他们的价格跌到最后，并继续提供工业用地，以诱中小企业和工作坊进场，因为当初就是政府促成的高房价把它们扼杀的。厂房写字楼不同住宅，不伤及中产阶级，政府想都不应想去救市，这才是积极不干预。

当然，政府应该用公权反垄断，为中小企业除障，甚至引导本地企业为内部市场生产中价值的进口替代，让本土经济也不但开动且能走向中价值、中就业。

城市本身是品牌，要有良好的营商、旅游和居住的软硬条件，要人家赞赏自己满意。在全球化状态下，城市品牌的经营可以创汇、可以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其中少不了世界性品味文化和精致生活带来的中价值内需。

我们不要那么失败主义的说要保障就业，只能一元是高价值低就业的，一元是低价值高就业的。在两极之外，应有更多层次，而作为政府的政策愿景，更宜奋力造就中价值中就业，或用我同代的经济学家曾澍基、陈文鸿的说法：是"优化的低价值高就业"。

如果香港没有新就业机会，有的也只是些很低价值的工作，这样的把部份人排拒在下的社会将是令人沮丧的。我这代很多人已上岸，可是在我们退场前是不是也应替下一代铺好路，总不该留下一个大多数人是低价就业的鸡肋城市给下一代。



要做出中价值，很关键的一点，也是我这代主流所忽略的，就是文化和价值观上，我们也要从边缘反扑主流。

以后人家需要的不是那些价低的产品，而是要创意、要想法、要服务、要弹性、要科技和文化内涵、要满足利基需求。

香港本身并不是没有这类文化、学术、技术和社会资源，无论是精雅的、通俗的、科技的、工艺的还 是另类的，香港全光谱都有，现都在边缘。不够的话，作为开放社会，我们现有的人材知道如何引进更多外面的人材。现在要做的是让这样的文化技艺和价值观走回 到我们社会的中心来，不能单靠我这代人过去那种考试过关、做个不能近观的道具、赚快钱的心态了。义大利工作坊里做个家具，要有资产性投资、技艺，审美品 味，也要愿花时间、有所追求。

我前阵子看过一篇大陆杂志的人物访谈，那大陆人说他最近去过一次香港后对香港的印象完全改变 了，他去了一家小小的冷门唱片店，在那里，他把他一生所有想找的唱片都找到了。原来香港什么都有，如果你真的去找的话，是什么东西都找得到的。但同时，它们又都是小小的，处于社会的边缘，而主流对文化学术一直少有理会，主流 1990 年代都在忙地产。

如果中价值中就业的产业是香港的出路，最终还得回到香港人的教育，建构较丰满的文化价值——但不要以我这代的主流为榜样。

（陈冠中，香港作家。原文链接：http://chenguanzhong.ycool.com/post.1139286.html）

【返回目录】



10-5 许骥：港督的声音，你可曾听得见？



“如果说今天弹丸之地的香港，还能称得上是中国社会的“榜样”的话，靠的就是彭定康口中的“弥足珍贵的资产”。我们理应对香港的未来怀抱信心，她是中国公民意识、法治、民主等等的先行者。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港督，一个香港人曾经如此熟悉，而现在却如此陌生的名词。在一九九七年以前，港督是来自遥远的岛国不列颠，由英女王授命，负责管理香港的政府官员。老香港人对港督虽说不上感恩戴德，但是没有人会否认，香港是在历任港督，尤其是在从柏立基到彭定康这最后六任港督手中，从一个普通的港口城市晋升到世界性大都市地位。这一点历史不会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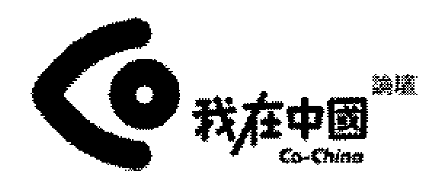
二〇〇八年香港电台庆祝开播八十周年，打算与香港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一些珍贵录音。经过近两年整理，《最后六任港督的声音——就职·施政·离任》一书终于出版了。按照前香港历史档案馆馆长 朱福强在“序”中所言，阅读此书“我们可以回顾英国政府在香港殖民管制最后四十年的重要施政”，“更能帮助我们深入窥见英国政府对香港管制的种种考虑，以及理念和态度上的改变”。此言不假。只是，作为一名“八〇后”的年轻读者（无论是内地的还是香港的），阅读这本书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香港的过去。在这个“景观失忆”如此严重，几乎所有人都以为香港从来都是如此繁华的时代，知道一些香港的历史，确实是很有好处的。

例如，现在到香港旅行的人大概都会觉得，香港是个很“浪费”的城市——冷气开得超低，电灯通宵达旦，街上设有直饮水……很难想象，香港在七十年代以前是个在水电资源方面均十

分匮乏的地方。淡水资源稀缺，以致于一九六三年香港遭遇开埠以来最严重的水荒时，政府不得不采取每四天供水一次，每次只供水四小时的限制措施应对。当时的港督柏立基在就职演说中，把旱情提到了最高议程的位置上。英国政府租赁运水船队为香港运输来八亿五千万加仑的饮用水。柏立基说："没有一个政府会比我们租赁委聘更大规模的运水船队。"他一边勉励香港市民"不懈地戒备，节约用水，减省至吝啬的地步"，一边积极与北京政府商谈，争取借调珠江水供给香港。至一九六五年（柏立基卸任港督后的第二年），随着"东江供水系统"建成，香港才摆脱了缺水问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香港经济起飞的重要酝酿期。不仅是香港，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地，都在蓄势待发，准备经历一场大变革。而此时上任的港督戴麟趾，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也透露了英国对香港的期许与愿望。他说："我们一定要确保香港过去数十年来的地位，继续成为一个有秩序、进步、稳定，以及给人希望的天堂，提供一个有信仰及信心的环境，让人民每日可以活在当下，而不须为昨日感到不必要的遗憾，以及为明天而感到彷徨。"又说："我们要设法使到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工作，如果有歧见的，不妨诚恳表达，但切忌无用及无谓的争辩。"其实香港在那个时候，远没有实现戴麟趾口中的那些"愿景"。彼时的香港，是一个治安差劲、秩序混乱、贪污成风、公民意识淡薄的地方。但是我们能从他的演说词里感受到一份决心。到下一任港督麦理浩上任时，港府就针对社会问题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改革。最功勋卓著的一项，自然是妇孺皆知的廉政公署。

廉政公署新官上任三把火，横扫香港的贪污之风，但也造成了严重的反弹情绪。一九七七年十月，廉政公署拘捕了一百四十名九龙区警官，两千多名警务人员因不满其做法上街示威，请求警务处长要求港 府削减廉政公署的权力，激进的警员甚至冲入廉政公署总部大肆捣乱伤人。面对难以控制的局面，麦理浩于当年十一月七日发表了《警员特赦令及修订警务条例》平息了暴动。具体的做法是，"不再追查一九七七年以前的贪污案件，已发拘捕令或案情严重的例外"。这一举措颇有成效，立刻缓和了矛盾。没过几年，香港的贪污之风即被扼杀。时至今日，香港已成为全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



麦理浩在任期间，还推动了多项利民政策，如一九七八年的"居者有其屋"计划。该计划帮助绝大多数香港市民圆了"住房梦"。一九七九年，"房屋委员会通过新计划，凡年龄超过六十岁的人，可用合伙登记办法申请入住公共房屋"，这就是今日所谓"公屋"的雏形。在这些利民政策的庇护下，当第二十六任港督尤德就职时，已经能非常自豪地说："香港已由一个平凡的海港发展为一个庞大而现代化的城市，足可与世界其他大城市媲美。"

尤德上任后，中英双方展开会谈。一九八五年，英国政府通过《香港法案》，宣布由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开始，结束在香港的统治。此后，香港和内地的联系愈发紧密：深圳罗湖双层人行桥启用、大亚湾核电站启建。港督也频繁造访北京，为香港经济推波助澜。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尤德在访问北京时突发心脏病猝死，成为唯一一位在任内去世的港督。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尤德的继任者卫奕信，以及末任港督彭定康，他们在任期间，香港的未来已经十分明晰。此时的香港，已经是数一数二国际化大都市。他们的任务是维持香港的繁荣，在此基础上，为香港市民谋求福祉。彭定康在就职演说中，说了一段颇为客观而且动人的话："香港能成为伟大的城市，并不是因地利而幸致，而是因为拥有珍贵无比的资产。在这个健全行政架构和法治社会中，香港市民生活、工作和共享繁荣，他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充沛的活力和干劲，不断的努力，就是香港弥足珍贵的资产。"

没错。如果说今天弹丸之地的香港，还能称得上是中国社会的"榜样"的话，靠的就是彭定康口中的"弥足珍贵的资产"。我们理应对香港的未来怀抱信心，她是中国公民意识、法治、民主等等的先行者。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最后六位港督的声音，值得温故而知新。

（许骥，香港明报世纪版记者。原文链接：http://my1510.cn/article.php?id=47119）

【返回目录】



10-6 港督彭定康告别演讲辞



“从来没有一个属地，在脱离殖民管治时，能够像香港这般繁荣昌盛，这般具备文明社会应有的结构和特质，既有各行各业的专才、不同的宗教、众多的报章杂志、蓬勃的慈善事业，还有正直忠诚、此志不渝地为市民和社会谋福利的公务员。”

对全香港来说，今天是值得庆贺而不是叫人伤感的日子。然而某些人也许多少有点感触。任何惜别的场合，都难免引起离愁别绪。容我稍后再细说。

历史不单是一连串的年月日。历史不仅是我们记忆所及的日子，还有那些日子前后发生的事情。要说香港的成功故事，得从今夜之前的年月说起，也必定会说到光辉美好的未来岁月。

香港的故事，当然并不限于英国管治下的一段历史，尽管今夜正标志着这段一百五十年历史的终结。

这段历史，是由上一世纪的一些事件揭开序幕。对于那些往事，在百年后的今天来看，当然没有人会试图为之解说。可是，我们该注意到，今天香港大多数人之所以在这里生活，是由于本世纪发生了一些事件，而对于这些事件，相信今天也没有多少人会加以辩护。这一切都提醒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应认清过去，这样便能够抛开过去，走向未来。

今天我们要庆祝的，是本港市民凭着冲天的干劲和无比的毅力，辛勤创业，为本港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当中，绝大部份是中国人，最初来到这里时，一无所有，只是一群平凡的人，但是他们努力不懈，终能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英国在香港的管治即将终结。我相信我们可以总结说，英国对香港的贡献，是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完善的架构，使香港人能够力争上游，创造美好天地。这个架构包括法治精神、廉洁开明的政府、自由社会的价值观、已具雏型的代议政制和民主社会制度。香港是一个华人社会，一个典型的华人社会，而又带有英国特色。从来没有一个属地，在脱离殖民管治时，能够像香港这般繁荣昌盛，这般具备文明社会应有的结构和特质，既有各行各业的专才、不同的宗教、众多的报章杂志、蓬勃的慈善事业，还有正直忠诚、此志不渝地为市民和社会谋福利的公务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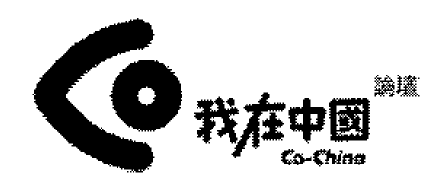
我深信，只要香港人坚守他们一向珍视的价值观，香港的前途必定越来越光明。香港的价值观正面积极，放诸四海而皆准。这些价值观也是亚洲以至其他地区未来的价值观。在明日的世界里，一个欢迎快乐、民生富足、充满信心和安定繁荣的社 会，必定像今日的香港一样，是一个能够恰当地把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加以融合的社会。

今天晚上，我们以及远在他方观看这个盛典的英国国民， 都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他领导的优秀班子，致以深挚祝福，祝愿他们顺利展开新工作。董建华先生和他的夫人，必定全心全力、竭诚为香港服务。全港市民以及海外人仕，都衷心希望他们面对未来挑战时，能够有卓越的表现和成就。

我刚才提到，对一些人来说，今晚的庆典难免夹杂了丝丝愁绪。

临别依依，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其他即将告别香江的人，心中都带着离别的伤感。我是第二十八任总督，也是最后一任总督。跟历任总督和他们的家人一样，内子、女儿和我，定会把香港的一点一滴铭记心中。大家待我们一向是那样亲切、友善，这份温情暖意，我们难以忘怀。过去五年，能够与你们共同生活在这片美好我的家 园，并且能够为你们的将来尽一点力，实在是我毕生莫大荣幸。如今，会由香港人管治，那是你们得到的承诺，也是一个不容改变的进程。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



Governor's Speech at Farewell Ceremony

For Hong Kong as a whole, today is cause for celebration not sorrow. But here and there, perhaps there will be a touch of personal sadness as is true of any departure, a point to which I shall return.

History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dates. What makes history is what comes before and what comes after the dates that we all remember. The story of this great city is about the years before this night, and the years of success that will surely follow it.

Of course, Hong Kong's story is not solely that of the century and a half of British responsibility, though it is the conclusion of that chapter that we mark tonight.

This chapter began with events that, from today's vantage point, at the end of the following century, none of us here would wish or seek to condone. But we might note that most of those who live in Hong Kong now do so because of events in our own century which would today have few defenders. All that is a reminder that sometimes we should remember the past the better to forget it.

What we celebrate this evening is the restless energy, the hard work, the audacity of the men and women who have written Hong Kong's success story. Mostly Chinese men and Chinese women. They were only ordinary in the sense that most of them came here with nothing. They are extraordinary in what they have achieved against the odds.

As British administration ends, we are, I believe, entitled to say that our own nation's contribution here was to provide the scaffolding that enabled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ascend. The rule of law. Clean and light -- handed government. The values of a free society. The beginning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and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This is a Chinese city, with British characteristic. No dependent territory has been left more prosperous, none with such a rich texture and fabric of civil society, professions, churches, newspapers, charities, civil servants of the highest probity and the most steadfast commitment to the public good.

I have no doubt that, with people here holding on to these values which they cherish, Hong Kong's star will continue to climb. Hong Kong's values are decent values. They are universal values. They are the values of the future in Asia as elsewhere, a future in which the happiest and the richest communities, and the most confident and the most stable too, will be those that best combine political liberty and economic freedom as we do here today.

All of us her tonight, and I am sure all my fellow countrymen and women watching those events from afar, wish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his excellent team the very best of luck as they embark on their journey. C H Tung and his wife, Betty, will serve Hong Kong with dedication, strength and enthusiasm. Everyone here, and people outside Hong Kong as well, will be willing them to succeed in the challenging years that lie ahead.

I said that tonight's celebration will be tinged for some with sadness.

So it will be for my family and myself and for others who like us will soon depart from this shore. I am the 28th governor. The last governor. Like all the other governors and their families, my wife, my children and myself will take Hong Kong home in our hearts. You have been kind to us. You have made us welcome. It has been the greatest honour and privilege of my life to share your home for five years, and to have some responsibility for your future. Now Hong Kong people are to run Hong Kong. That is the promise. And that is the unshakeable destiny.

June 30, 1997

（彭定康，香港最后一任总督，现任牛津大学校监。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6447）

【返回目录】



【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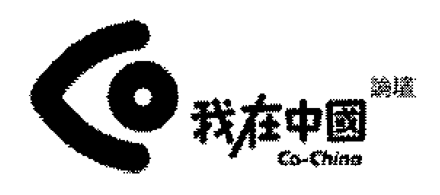
10-7 陈竞新、李慧：李彭广解读英国治港谜团

"我们要参考英治时代的管治方式，不是叫英国人回来管香港，但有些功能性方向却是必须掌握的，像相关人才库的培养，政策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组织架构达成同样的功能，香港现在的问题，是连达成这功能的管治概念都没有。"

香港回归即将十五周年，回归前备受赞誉的公务员队伍为甚么回归后不久便被认为表现欠佳呢？在英治期间一直被视为治港骨干的政务官员，为何回归后的执政表现未如理想？

香港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广看在眼里，感触良多。五年前他开始查阅大量英国解密档案文件，了解港英管治体制的精髓，发现回归后的香港并没有从知识上厘清港英管治系统的真实面貌，却自以为延续了英治时期的政治体制，乃撰写《管治香港》一书，书的副题为：英国解密档案的啓示。他期望能借此探索香港目前管治缺失的根源，并为改进提供思考线索。

李彭广对亚洲周刊表示，英政府过去对香港的管治系统和组织设置，还有管治人才的培养调度，都是"离岸"操作的，整个班底不仅由英国派遣高官组成，还有在伦敦从事政策研究的智囊襄助，为香港的管治和决策提供参考，至回归后随着海外公务员及殖民地公务员队伍撤回英国，香港的管治体制出现了根本性改变，管治系统呈现断层，问题频生。他说："特区没有积极推行管治系统的重构和更新工程，也未重视培养政治领袖和政策研究，以至未能抵御因英国撤出香港而带来的"真空"影响。"



李彭广所谓的"真空"，正是香港知识界广泛的感受：英政府撤出后，港府的"大脑"好像也跟随撤走，只剩下一群技术官僚。他说："香港一般概念认为，九七年回归前后的港府都是同一批人，我敢说，这起码说错了一半，那些从英国被派到香港管治的政务官，和现在在港本地招聘的政务官出自两个不同的系统。"

他慨叹说："社会对港府管治系统欠缺知识性的掌握，出现了认知缺失，让一些对香港管治毫无认识的人来担任管理工作，岂不是缘木求鱼？香港虽然已不是英国殖民地，但是我们必须要疏理好香港过去是如何被管治的，才能有个基础，进一步研究有效的转变路径。"

香港公务员队伍一直被视为香港成功发展的重要基石，不论北京或香港各党派人士，都视之为香港的宝库。李彭广根据英国国家档案馆已披露有关香港管治的资料，重新检视这种认知。他指出，英国过去派遣到港的政务官一般都是根据管治殖民地的标准和要求招聘的，并曾经在多个殖民地担任不同职位，累积相当多经验，他们到港并不是一般所认为的执行政策，而是"实际负起管治殖民地的工作"；相反，在香港本地招聘的政务官不但只有在港任职的经验，而且招聘的标准是"一般办公室"的工作包括政策制定、执行或财政管理，不会要求具有任何政策视野"。

AO 的缺陷

他说："这些 AO（政务官 Administrative Officer）很多现在担任问责官员，负起管治责任，但以他们的背景，没有相关的政策技巧、文化或训练，不就出现了现在官场滥竽充数的现象了？政治人才是专业，香港社会却普遍只知官员和议员，但人才库有三个方面，上游是大学的研究和培训，中游是民间智库或政党，给有心人十年二十年的磨鍊机会，至于官员和议员，数量有限，只属下游，如今港府全面推动问责制，并不是错，但只涉及一小部分，实在不够理想。"



李彭广在《管治香港》一书中以大篇幅论述英国如何为殖民地建立人才库。他说，殖民地时代，英国在香港的管治班子多达数百人，其中被纳入为管治核心的，只有十多人，到了回归前几年，开始有华人政务官被吸纳进这核心，除警务处长外，第一位进入的华人是在一九九三年出任布政司的陈方安生。

缺乏视野和管治意志

不过，李彭广认为，这批华人高级公务员始终是执行政策的技术官僚，缺乏宏观政策视野和管治意志。

李彭广指出，英治时期的香港管治班底除了港督为首的核心管治团队，还包括很多辅助性的机构，负有支援殖民地管治和功能的责任：情报收集和分析、政策知识的创造和应用，还有政策参考和建议。

李彭广又说，政策研究分开三个层次。包括政府部门内部研究单位，例如在英国的殖民地部有一个研究科专门研究殖民地政策，另外还有社会的各式智库和大学内的研究机构。他说，三个环节是一个链条，缺少了任何一部分，知识都无法普及，他批评香港现在的大学课程尤其是研究方面，并没有回应香港社会的需要，像大学的奖惩制度只鼓励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诱导学者进行理论研究重于实证需要，学者自然罕有为香港社会问题出谋献策。他说："这也是我们所有关心香港前途的人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为甚么回归十五年了，竟然欠缺更多客观了解香港实际情况的扎实研究？"

英国国家档案馆位于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邱园（KewGardens）旁，藏有大量珍贵的历史文件，是全球学术研究人员的聚焦所在。根据英国最新通过的信息法，伦敦当局在各部门考量下，有披露官方文件的义务；香港近年开始有学者前往档案馆搜寻殖民地时期的历史资料包括一九六七年发生的"六七暴动"，以及战后的中英关系进行专题研究。李彭广回归之初惊觉特区政府的管治碰上障碍，经过争取，二零零三年二月在岭南大学成立公共管治部，四年后开始透

过网上掌握资料馆内有关香港殖民政府管治的已解密档案，并在英国聘请研究助理，到馆里影印了"数以万页"资料，精研细读。由于部分在网上显示的档案并未公开，甚至有些已公开的档案竟有数页未获解密的，使查阅资料的功夫更为耗时。

李彭广谈及搜集资料的过程时说："这是宝藏，虽然投入研究的资源跟回收是不符比例的，但是这里藏有殖民地发展和管理的丰富资料，对掌握香港的过去，进而研究未来的发展，非常有知识含金量。"李彭广根据英国解密档案出版了这本有关香港殖民地管治的书籍后，在他眼中就是扎稳了根，打好了基础，已着手继续撰写下一部有关香港管治改革的作品。以下是亚洲周刊对他的专访：

香港已回归，并落实港人治港，以英殖民地管治方式比较，是否合适？

的确有意见认为香港已经落实一国两制，英治的那一套不应再管了。但如果这种说法对的话，怎么我们又会经常听到评论说，公务员是治港的骨干？这岂不就是认同香港有独特的管治历史，我们必须予以理解？我们要参考英治时代的管治方式，不是叫英国人回来管香港，但有些功能性方向却是必须掌握的，像相关人才库的培养，政策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组织架构达成同样的功能，香港现在的问题，是连达成这功能的管治概念都没有！所以我们需要先梳理以往香港是如何被管治的，港英政府是透过甚么做法达成这些功能，作为在港人治港的框架内作出转变的起点。

据您在书中说，港英殖民政府有时候面对施政困惑，会直接请教伦敦提供意见，您会鼓励现在香港特区政府面对施政困难时，采取同样态度，请北京出手帮助吗？

我们知道，港人治港虽然并不等于完全自治，始终是高度自治。香港像二零零三年饱受金融风暴和"七一"大游行社会浮动之际，算是非正常状态，中央领导人是希望一国两制成功的，



北京便伸出援手，这或许是有争议的，但无论如何，香港必须先建立好自己的制度。本地化不仅是人的本地化，还要顾及政府的功能以及政治人才的培训，如果香港政府一天不做好建立人才库和政策研究，一天就会有所谓"真空"的存在，这样，中央就会比香港政府更着急，很自然会有一个诱因：让我先帮助你吧。所以说要高度自治，香港就需要建立与这个原则匹配的配套，让香港能支撑自己制度的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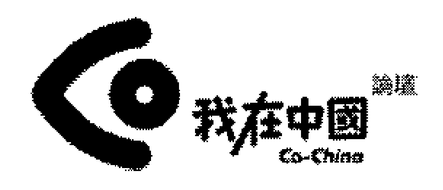
您在书中以大篇幅谈论港督与伦敦的关系，将这与特首与北京的关系比较，是否妥当？

当然可以。宪制上，港督由英国派出，外交部是他的上级，但实际施政过程，伦敦都会尊重港督作为一个在地最高级官员所作的判断，伦敦能派他出来，自然要信任他，尊重他的决定。而且本地民众也要认同港督是港人的总督，这样他才能有管治权威，因此英国有一个原则：在地的总督握有殖民地管治的最后决定权。我在书中举出很多例子，他必须有能力在伦敦和本地民意之间进行调和。

至于特区行政长官，其两面性的需要比港督更强。宪政上，北京对特首任命权是实质的，特首自然要听北京的，问题是特首某程度上由香港选举产生，更有代表香港的味道，所以北京必须要面对这情况，给予香港特首更大的空间，如果北京没有这量度，特首是没有办法作好管治的。但当然前提又是那句话，香港必须先有好的管治系统，让特首能作出有效管治，特区才能有跟北京互相尊重的条件。

（陈竞新、李慧，亚洲周刊记者。原文链接：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kk&Path=2409427812/23kk1a.cfm）

【返回目录】



10-8 Hugo Restall：英国统治香港时更好

“正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错置，明白自己作为外族的官治权受质疑，本港政府并非选举而生，故而致力避免与民众疏离。他们的忧虑使他们触觉敏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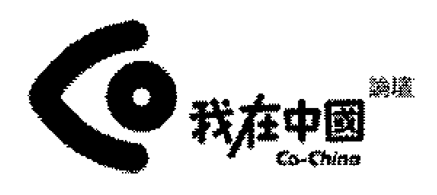


北京钦点的香港下任特首唐英年的慢动作内爆，让人想起 1997 年回归不久前，前《远东经济评论》编辑戴维斯 (Derek Davies) 的演说。该演说题为《两赞殖民主义》，旨在尝试解释为何香港会在英国管治下兴盛。十五年后，那些难以管治香港的中国官员，可能应该看一看这篇演说。

英国人创造了一个相对廉洁并能干的公务员队伍，每天管理这城市。戴维斯先生的英国同胞未必会喜欢他对英国人的描述："他们沉醉于各类的会议记录、草案、正当 渠道、先例，甚至是他们用来防止档案夹内纸张的圆孔破裂的红胶纸，都喜爱不已。"不过，起码这些程序有助令人尊重法律，并防止滥权。

在公务员之上的，是由伦敦委任的高级官员。这些上等人通常都自视过人，鄙视记者和其他"不利"的批评，但他们倒是会透过报纸和其他途径在回公众的意见。

其中部份原因，是因为香港官员要向英国的民选政府负责，而英国民选政府对有关管理殖民地不力的指责十分敏感。不过，在港官员在处理本地事务时，不时会叛逆伦敦的意思，令殖民部的保守官员沮丧，有时甚至戏称香港为"香港共和国"。有数十年的时间，香港的管治水准比英国的还要高。





戴维斯先生完全命中香港官员力争卓越的真正原因："正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错置，明白自己作为外族的官治权受质疑，本港政府并非选举而生，故而致力避免与民众疏离。他们的忧虑使他们触觉敏锐。

共产党指欧洲列强掠夺了殖民地的资源，并强使殖民地成为宗主国的生产商的市场。不过，香港除了逃避共产党的难民外，甚么资源也没有，却吸引了投资者，并建立了轻工业，把产品输回英国。论到抽回利润，戴维斯先生指出："没有英国公司会如此疯狂，把利润转回重税且不断贬值的英国。"

大部份驻港官员退休时会返回英国老家，故此他们不易受诱惑把利益输送予本港精英商家。退休时，政府会给他们颁赠退休金，和大英帝国勋章。地政总署的官员，不用担心在作出对最大地产发展商不利的决定后，自己的孩子可能难以在港找到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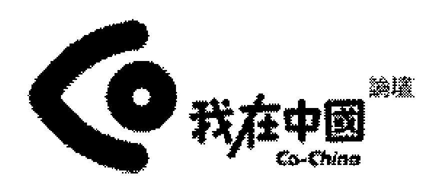
与回归后的香港比较，政府依然不是民选的，但现政府却要向一个贪污严重并滥权的一党专政国家负责。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还有北京属意在数月后成为特首的唐英年，都是在1949 年后移居香港的上海精英商家的一份子。行政架构只局限在某一撮人手上。

这些转变引来连串后果，当中一些与土地有关，而土地全是由政府释出的。地产发展和增值是香港财富的最大来源，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引发最多不满的来源。

地政总署近年在土地发放的谈判上作出不少"错误"，让发展商得到以十亿计的额外利润，数名高级官员在离任后转为地产商工作。这些都令公众嘲讽香港已沦为裙带资本主义之地。

这解释了为何公众对唐英年非法加建 2400 呎地牢如此反感。同样，现任教育局局长孙明扬，在 2006 年未有依地政总署要求拆除僭建物，其实作为当时的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他的罪行可算更为严重。

在这两个例子中，问题并不只是规划和安全。僭建面积欺骗了政府的收入，但唐英年要面对检控的可能并不高，因为无论在他以上或以下，都没有足够独立的人能要求他负责。于是，现在形成对公众有一套法则，对商家权贵又有另一套法则。



在英国管治下，香港兼享两极的好处：既有民主的保护，又有伦敦输入的高效能而心存忧虑的行政人员。现在的香港却兼受两极的坏处：既有越益严重的贪污，又有得到专制政权加持的软脚蟹本地管治班子。唯一的好消息，是媒体还能自由揭发丑闻，不过这种自由也不知能再维持多久。

管治香港的中国政府不直不太理解的一件事，就是若要香港维持不变，就只能接受转变。这个城市的人，再不是甘于受外人统治的难民，而民主是唯一能与英国管治下的混合式政治负责制匹敌的制度。

戴维斯先生最后如此评鉴殖民主义的优劣："我只期盼并相信，在未来，不会发生香港人把英国游客拉到一角，悄悄说，香港还是在外国的恶魔管治时比较好。"十五年后，越来越多人如此感触。

（Hugo Restall，《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编辑。原文刊于《华尔街日报》，林书翻译。原文链接：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970203960804577239252005926874.html）

【返回目录】



10-9 石七刀：让历史重光

“重构当时的历史，令我们更清楚，回到过去并不是一条出路。因为现时香港出现的民生问题，是港英时代资本主义剥削的延伸。打破现存的制度是必须的，但也不能够依靠某一政权恩赐福利给我们。”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1997 年以来，反对回归中国或回归后社会状况的声音一直不绝。面对日益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各党派提出了 自己关于“中港关系”的论述。其中一部分人，怀缅港英殖民统治是香港的黄金年代。那时港英施政为人民着想，特别是麦理浩时期开始推行的福利改革，让港人分享繁荣成果、拥有高的生活水平。他们认为现在香港比那时差，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用说，政府就必定更残民自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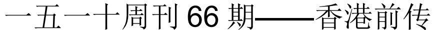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让我们钻进那个令他们怀缅的 70 年代。本文尝试从事实数据和史实两方面，带出当时的民生与政治状况；以及指出港英政府的利民政策，如福利、大规模公共服务工程或发展香港经济，其实并没有利民目的。

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民

首先让我们翻查 1971 年的人口普查报告：在当时 160 多万的劳动人口之中，大概有 62 万人住板间房、5 万多人住临时搭建的小屋、2 万 7 千多人住天台、地 库、士多房甚至走廊。[1]这些劳动人口的工作状况亦不佳：有 17 万多的工人每周工作 75 小时或以上，其中 1 万 3 千多名更是工作起码 105 小时[2]。接近 3 万 6 千名是 10 至 14 岁的“合法童工”[3]。

医疗福利方面，当时在新界，每两万人才有一名医生。在 1973 年，包括私人医院在内，全新界只有 238 张医院床位。然而，新界在 1971 年普查的人口，是 66 万 5 千 7 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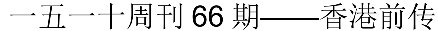
那么，差不多时候的政府开支等数据又如何呢？我们不妨看看 1969-1970 财政年度的报告：警察开支有 1 亿 6 千万港元；英军有 8 千 8 百万港元；而社会福利，只占 190 万港元。同年度的财政盈余，却高达 6 亿 1 千 900 万港元！

让我们分析一下以上这些数据。为什么港英政府会在警察上支出庞大？原因便是因为六七暴动期间，港英政府镇压了大量反殖团体。暴动以后，警察需要大规模动员去镇压示威者，维持殖民政府的稳定，港府警力增近六成；加上公安条例出台，需要管制人民游行集会，种种措施令警察开支庞大。在维稳这方面，这些措施 的确效果显著。1971 年 7 月 7 日，威利警司带领警察，镇压保钓的示威者。当时警察出动千多名警察，以一比一的警民比例镇压示威者。威利警司更以灌铅的警棍攻击示威者令其头破血流。另外，亦由于政府上述的各项措施，令到斗争无法扩大规模。就是 1973、1974 年的社区斗争、工人斗争及社会斗争，亦是零星而小规模的。70 年代初的示威运动并不是无中生有的，正正是因为当时候生活环境困苦，福利及保障极少而造成的。

另外，70 年代的港英政府，亦非一个民主的政权。当时，所有政党都是非法的，工会不能设立政治基金参政，也要经政府批准才可以加盟国际上的组织。行 政、立法两局全部议员由港督委任，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悉归港督统领。连没有任何实权、只对市政卫生等问题有咨询权的市政局，在 1973 年改组前只有 10 名选民人数极少的民选议员，此后委任、民选议员各占半数。

繁荣背后的真相

麦理浩上台以后，香港经济有惊人的增长率。这个年头似乎是香港市内一片繁荣，民生亦摆脱 70 年代初的困局。但是，从事实上看，当时是否这么歌舞升平？当时候因经济增长而施行的措施，最大得益者又是谁？



1975 年的财政预算案中，财政司发表了预算近九亿元赤字的预算案。故此他建议加税加费，广达 18 项之多。其中包括：烟酒税、公司利得税、普通差饷、印花税、娱乐税、博彩税、水费、邮费、商药登记费、公司注册费和银行牌照等。 [4]

1976 年香港有高度的经济增长率，高达 18%。港英政府在这高增长率底下，推行各项增加收入的措施，例如加地价、房租、税收及差饷。这些措施令政 府在 1977 年收入大增至 40 亿，盈余达 7 亿 6 千 6 百多万。另外，政府在 70 年代透过解决徒置区问题，空出大量土地，直接导致到政府的土地收益由 1976 年的 4.41 亿元，增加至 1980 年的 39.3 亿元[5]。要知道这金额究竟有多高，可以参考当时的入息中位数：1978 年只有 700 多元，1981 年只 增至 1000 多元。

综观 70 年代的社会福利开支，只占政府总开支的 4-5%，80 年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 0.5%。1972 年 8 月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十六届国际社会工作会议中，国际社会亦批评"香港没有一个长远的、完整的社会发展计划；只有为迎合某种特别紧急需要而制定的临时社会计划，这种过于谨慎的社会发展策略，最显著的两个例子是免费小学教育及公共援助计划的延迟实施。形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因素，是香港的自由企业传统，过分强调经济发展。"[6]这个批评，其实就是 指香港长期以来，由于要维持社会稳定，必须提高社会福利，但是开支却"过于谨慎"和势利的评价。往后麦理浩的施政，亦不出这一评价。

港英政府收入庞大、福利开支极少，巨额财政盈余究竟用在哪里，又对谁有利？这涉及当时香港的经济结构。当时香港经济的核心，包括银行、保险、地产， 和公共事业，都是英资大企业控制的。例如怡和控制当时最大的地产公司置地，亦操控电车、小轮、电灯、电话等公共事业。另外，发钞、息率等等关键的政府功能，都由英资财团直接控制。比方说，当时发钞的是汇丰、渣打两家银行，汇丰更领导设定利息的银行公会[7]。政府没有独立的金融机构，70 年初和中期，港英政府的财政储备，是直接交回英国政府手中，或是存入上述两间银行的[8]。港英政府变相为英资金融资本打本、由此将大量资本交与其它英资财团运用的做法，使英资得以长期操控香港经济。在此提供一个粗疏的解释：当钱存入银行，就成为了银行资本的一部份，银行能支配这笔钱。如此一来，它们可以用这笔钱，利用自己在香港庞大的经济实力投资

获利。所以，政府的收入，其实就是协助当时英资财团获利的工具。港英政府同汇丰的这种特殊关系，是非常直接而露骨的化公为私。就是这样，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香港劳动人民的血汗钱，转化为英国大财团的资本。

在港英政府为英资金融资本累积大量资本的同时，操控民生要害的大财团也获利丰厚。中华巴士公司 1976 年纯利达 1 千 5 百 50 多万、九巴纯利 4 千 4 百 多万、香港隧道公司纯利 7 千 2 百 30 多万……但是，普遍劳动群众的生活又如何呢？他们工资的增加，扣除了通货膨胀、直接和间接税、屋租、物价、交通费的增 加后，他们的实际工资大多不升反跌，更遑论当时开工率只有七成的纱厂工人、四成的布厂工人和五成的制衣厂工人了[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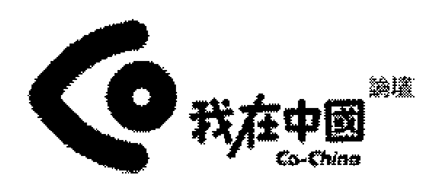
从以上数据和历史背景指出，当时候经济增长的最大得益者，正是资产阶级。政府固然有巨额收入，但是主要而言，其实这笔钱，就是被财团投资的工具，最终得益者仍然是资本家。而一片繁荣的景象背后，普通工人的实质薪金，有些只有轻微增长，有些更下跌了。

福利往何处去?

麦理浩执政时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其福利政策，尤其是房屋政策。这个人称"麦理浩时代"的光辉岁月里，香港的民生问题似乎得到完善解决。但这是否真的港英政府的皇恩浩荡？还是背后另有原因？

港英政府安置寮屋和木屋居民，其实是因当时政府是鉴于寮屋火灾会为香港政府造成庞大的财政负担，才决定安置寮屋区[10]。并且，安置寮屋区能令土 地有其他形式的发展用途，而这些发展是能够令作为地主的港英政府直接得益的。透过这样去获得更多土地空间资源去获利，亦是港英政府公屋政策的立足点。 [11]

1980 年初，政府鼓励私人发展商重新发展社区，那就是市区重建和建构土地发展公司。当时的天台屋，因为这些天台屋大多时都与该区的私人重建计划有关，所以成了重点目标。有关楼宇重建和买卖换转，是建基于清晰的产权安排。而天台屋或笼屋则阻碍了业权的转换。于



是私人物业拥有者就透过《建筑物条例》去 保障其产权的完整性和可转买性，指责天台屋居民“非法占用”。如此一来，港英政府介入物业方面的行动，就由能直接牟利的官地，转到私人物业，协助私人发展商图利。这些介入导致天台屋居民受尽压迫，面临迁拆。最鲜明的事例，就是1994年荃湾金轮大厦天台屋的抗争。

回到公屋居民的情况。1977年和先前的几年，公共楼宇的租金不断上涨。在1977年的施政报告中，麦理浩宣布不再以房屋政策作为社会福利的一部份，并要求今后由公共房屋的居民去负担房委会负欠政府的50亿“债务”。旧徒置区改建，成为了暴增屋租的借口。安置区也因为他们的经济能力太低，而被政府 认为提供公屋予他们是不划算的事情[12]。

麦理浩会有这些措施，其实十分正常。因为公屋政策本身，并不是要成为社会福利，而是为了控制寮屋区、徙置区的潜在危险。当时居住问题，被政府认为是社会混乱的泉源。例如，当时的徙置区居民人口混杂，黑社会争地盘、打群架、非法聚赌等问题严重。1973年后，政府推行十年建屋计划，实质就是一个以新市 镇计划为主的人口分散政策，在不同地区大量兴建公屋，分散各地的中下和低收入家庭。透过分散人口，减少贫民聚居带来的混乱[13]。说到底，社会的秩序才是港英政府最关心的事情，而不直接是民生问题。

拆破经济增长的光环

当然，公共房屋政策，的确直接改善了公屋居民的居住环境和质素。但政府有能力去支付公屋发展，其实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经济发展的结果，亦并非如坊间所说，是港英政府“治港有方”的功劳。

1970-1980年代，香港转变成一个地区金融中心，以及恢复和发展其转口贸易，导致经济增长。这经济增长，主因并非政府的远见，而是与世界的政 治及经济关系有关。其中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开放市场。1970年代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中共同西方全面修好，蒋政权被逐出联合国，国际资本开始觊觎中国内地这个庞大的市场。于是，英殖统治的香港，便发挥了作



用。各国资本家利用香港作用对中国贸易的桥头堡，外国资本亦开始在香港集资。例如外资银行。在香港当 时 154 间银行中，有 120 间是外国注册银行。267 间接受存款的公司中，215 间为外资拥有。香港对中国是净债权人，在 1987 年末债权达 174 亿港 元。这种种都显示，对中国而言，香港是重要的离岸外贸金融中心[14]。

在转口贸易方面，并非由于港英政府的远见，而与在中国加工的工业有密切关系。在 1988 年第三季，香港对中国的总出口、本地出口及转口中，涉及在中国加工的百分比分别为 48%、73%和 37%[15]。

总言之，中国同以美国爲首的西方国家修好、推行开放市场政策，是香港在 1970 年代末经济地位根本改变的决定性因素。若果只看见港英政府的“远见” 而忽略历史基础，实在是有所偏颇。这正如研究英国政治和经济史的穆尔（Lennox A. Mills）所说：“分析使香港繁荣的不同背后因素，出现一个不吉利的相同因子：这些因素大多是香港力量所不能控制的。”[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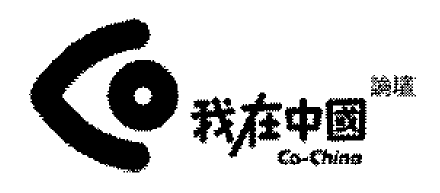
特区政府作为港英时代的延伸

无论是回归前或回归后的香港政府，他们施政的目的，在于协助资本家牟利和进行资本累积。我们必须放弃对港英政府的怀缅，而去真正思考我们目前面对的结构性问题：香港是一个高度依赖世界市场的城市。在一国两制底下，香港的资本主义被保留下来，资本家得以继续垄断香港的经济，继续剥削香港的劳苦大众。重构当时的历史，令我们更清楚，回到过去并不是一条出路。因为现时香港出现的民生问题，是港英时代资本主义剥削的延伸。打破现存的制度是必须的，但也不能够依靠某一政权恩赐福利给我们。

注

[1] Table 6.5.1. Hong Kong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1971

[2] Table 31. Hong Kong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1971



[3] 即已登记的学生工和女工

[4] 海风着，〈揭开新财政预算案的本质〉，《中大学生报》，1975 年 3 月 20 日

[5] 冯邦彦着，《香港地产业百年》，页 130，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6] 邓树雄着，〈香港公共财政史〉，页 19

[7] 冯邦彦着，《香港英资财团》，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

[8] "港府外汇、财政储备和政府现金收支，主要由外汇基金和库务署分别承担管理，再由这两个机构与有关银行往来。一般估计，港府存于各银行的款项中，汇丰占一半以上。"冯邦彦着，《香港金融业百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9] 吴仲贤着，〈评麦理浩的《施政报告》〉，《大志未竟》，页 382-384

[10] Smart, Alan. The Shek Kip Mei Myth: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rs in Hong Kong, 1950-1963. p106.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11] Smart, Alan. Making Room.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1990

[12] 同注八，页 385

[13] 同注五，页 216, 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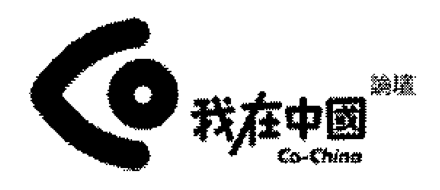
[14] 吴仲贤着，〈香港经济发展的批判理论〉，《大志未竟》，页 39

[15] 廖柏伟、王子渐、宋恩荣、刘佩琼，《中国改革开放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研究报告》，页 31，香港：南洋商业银行，1992

[16] 同注十二，页 28-29

（石七刀，中大学生报总编辑。原文刊于《中大学生报》，链接：http://cusp.hk/?p=2771）

【返回目录】



10-10 梁文道：抛弃幻想



“真正的重点在于我们自己；当年港英若有‘仁政’，那是香港人抗争的成果，绝非政府开恩；今天想要民主公正，就不能期待中央开明梁振英开窍；历史的动力只在我们身上，历史也只应该由我们自己书写。”

老牌艺术团体“进念．二十面体”原来已经成立了三十年，前几天和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谈到它的风光历史，自然得说《鸦片战争——给邓小平的四封信》。那是一 九八四年的事了，当年我还在台湾上学，没来得及亲睹这齣名噪一时的实验剧。但我晓得这部一连四晚，每晚从 11 点半做到凌晨 12 点半的戏有多哄动；我还晓得 港英政府听说戏名之后非常紧张，曾经要求“进念．二十面体”事先呈交剧本审查。听到这里，朋友便问：“审查？那时候演话剧要审剧本吗？”

我该怎么解释才好呢？当年港英手段机巧，表面上没有正式的文化审查制度，实则暗藏机关，常常选择性地调控让它敏感的事物。说聪明，它确实要比今日特区政府聪明；说自由，我就无论如何都不能承认当年的香港有多自由了。

现在有一批没怎么经历过港英统治的青少年喜欢怀旧，时时浪漫过去，把它形容为一段人间罕见的黄金岁月。就好比大陆最怀念毛泽东的人群中居然包括一些根本没 见识过毛时代的八零后。怀旧总是政治的，我们怀旧往往是因为我们厌恶现况，希望对抗它改变它，于是美化昔日，把它当成一种资源，以记忆撷取力量。类似的情 况还包括大陆近年来的“民国热”，大家总爱对比民国之美好与共和国之糟糕，拿过去嘲讽现在。



然而事实残酷，民国要是真有那么好，它就不用垮得这么惨了。同样地，我们也不必为了当前的抗争而美化港英年代的政府统治。请注意，我并不是真的要比较今昔，也不是说回归之后其实要比从前还好，更不是想宣说一种既然大家都很烂所以什么都应该接受的历史虚无主义。

真正的重点在于我们自己；当年港英若有“仁政”，那是香港人抗争的成果，绝非政府开恩；今天想要民主公正，就不能期待中央开明梁振英开窍；历史的动力只在 我们身上，历史也只应该由我们自己书写。拒绝怀旧，不是为了颂扬现况，而是勇敢地承担该轮到这一代人去承担的责任；否则我们又怎能对得起昔年努力过的人呢？例如巧妙抗衡过剧本审查的“进念．二十面体”。

（梁文道，香港文化人。原文链接：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E6%A2%81%E6%96%87%E9%81%93/art/20120623/16451612）

【返回目录】



【洞见专栏】

陈仲伟：大陆与香港，谁在影响谁？

1997 年香港回归之后，究竟是香港急剧“大陆化”，还是中国大陆被香港悄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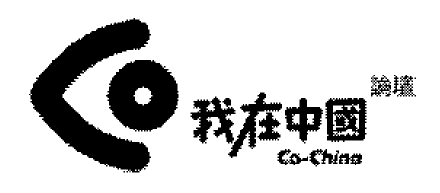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前主任张赞贤（Peter T. Y. Cheung）在最近一期的《亚洲研究》（Asian Survey）中撰文说：在两地不断深化的政治经济融合中，香港的确正被大陆迅速影响——作为一个城市，它的体量比起大陆来说的确是太小了。但尽管如此，香港仍然对大陆发挥着与其自身规模“不成比例”的影响。

在张赞贤看来，香港影响大陆有四种渠道：宪政架构、政治领域、思维方式和政府间合作。

在宪政方面，张赞贤认为，香港的半民主体制对大陆支持渐进改良的官员与学者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而香港的法律地位及其与北京的互动，可以视作“联邦制”在中国的实验，对中国这样一个缺乏联邦经验的国家很有帮助。

在政治领域，香港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在支持大陆民主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港籍全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参与和影响了大陆的政治体制，不过这种影响还比较有限；另一方面，香港的政治活跃人士亦有积极参与，并起到示范作用。

张赞贤在文中还表示，在思维方式方面，香港也对大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香港出版的书籍、报刊难以在大陆发行，有线电视难以在广东省以外落地，但香港的新闻出版物还是给大陆带来了多元的信息，为大陆媒体提供了不少借鉴。随着 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推出，越来越多的大陆居民可以自由前往香港，不少人会阅读和购买港台书籍。此外，截至 2010 年，有约 35000 位大陆专业人士与 8795 名大陆学生在港工作或学习，他们也会将来自香港的新鲜思想带回中国大陆。



在政府间交流方面，不少香港官员受聘出任大陆政府顾问，大陆公务员赴港交流与接受培训，大陆对香港反贪污方面经验的学习，对大陆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有大有帮助。尽管香港与大陆分属不同法系，大陆很难系统地模仿香港法治，但近年来两地司法交流的日益密切依然能增进大陆法务人员对法治的了解。此外，在国家与区域发展规划、食品安全、公共健康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尽管香港并非主导者，但在合作进程中也会对大陆政府带来积极影响。

文末，作者以深圳为例展示了香港对大陆影响的具体表现——在深圳的行政体制改革中，香港的行政体制成为参照系。港深在浅水区的合作中，深圳在金融、行政与司法领域，均效法香港而非上海。作者认为，一旦中国全面开启政治体制改革，深圳很可能再次成为试验区，香港将藉此发挥更大的作用。

【返回目录】

【FMN 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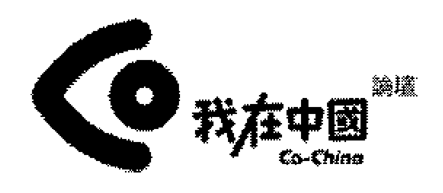
四川什邡事件

四川德阳**什邡**要开工一个钼铜项目，并在 6 月 29 日举行了开工典礼，但是当地居民认为这一项目会污染当地环境，在开工前就多次抗议阻止这一项目的上马。事件到了 7 月 1 日引发了学生们的抗议，并在 2 日开始转化为大规模的抗议事件。当地政府表态称会让涉事企业停工。
新闻：http://fmn.cc/No2v53

事件引发**什邡**市政府的关注后，什邡市发布了致市民的一封公开信。其中写道，“7 月 1 日，是党的生日。别有用心的人包藏祸心、捕风捉影地宣传该项目，鼓动不明真相的学生集访中共什邡市委，引来群众围观”。文中还称煽动者是“给第三国反人类的“法轮功”、达赖分裂集团等提供资金。”
新闻：http://fmn.cc/M7pLqw

什邡市市民因反对钼铜项目的建设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7 月 2 日上午，这一事件演变成当地居民冒雨反对钼铜项目的示威活动，而什邡政府却派出大批武警并释放催泪弹欲驱散抗议的民众，从现场网友的照片来看，现场催泪弹释放出的气体四下弥漫，并有多名市民因此受伤。这一事件也成为了当日的网络关注焦点。据悉，抗议活动持续到了当日深夜。
新闻：http://fmn.cc/Nr2zkC
视频：http://fmn.cc/LTXbwC

什邡市公安局 3 日上午《什邡市公安局关于严禁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通告》，通告中称“凡正在通过互联网、手机短信和其他方式煽动、策划或者组织非法集会、游行、示威者，必须立即停止违法活动，并自行采取措施消除影响。否则，一经查实，将依法处理。”什邡市还表



示事件中没有人死亡。

新闻：http://fmn.cc/M7qN5Wfmn.cc/M37kTO

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7 月 3 日晚发公告称，接到什邡市人民政府通知，要求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停止建设。公告中提到这一项目已经通过环评，由于引发民众抗议，因而政府决定停止建设。

新闻：http://fmn.cc/M2XEXP

由于民众的抗议活动成为了议论焦点，**什邡**市委、市政府 7 月 3 日下午发公告称，决定"今后不再建设钼铜项目"。文中称，钼铜项目是"5·12 特大地震灾区产业发展振兴的重大支撑项目"，"在今年 3 月 26 日通过了国家环保部的审批。"文中依旧称，"由于前期宣传工作不到位，造成部分群众对该项目的不了解、不理解、不支持。"

新闻：http://fmn.cc/M338Sy

7 月 4 日四川省**什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针对宏达钼铜项目群体性事件,上发布了《什邡市政府新闻办通告（三）》。称为及时平息事态,公安机关依法对 27 名涉嫌违法犯罪人员予以强制带离。其中的 21 人于 3 日晚 11 点被释放，有 3 人被刑事拘留，还有 3 人被行政拘留。3 日晚还有大批民众在市委政府外聚集，要求释放被抓捕的人们和学生。

新闻：http://fmn.cc/LX8Fze

由于前一日政府已经宣布不再建设宏达钼铜项目，受此影响**宏达股份**在 4 日下午跌停。7 月 4 日的什邡白天形势较为平稳，已经不再有警察对民众的显性暴力，但市委政府和什邡中学门前仍有市民聚集，要求释放被扣押的学生和市民。同时有不少人士赶到什邡，亲眼见证了

新闻：http://fmn.cc/MKlcW7

从成都赶赴**什邡**的作家李承鹏 7 月 4 日发表了名为《一次路西法效应实验——什邡小调查》的



博文，尽管发布 3 小时即遭删除，本文被大量转载，文中记述的 3 名事件中伤者的遭遇和他们的伤情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我们保留了一份图文版。

新闻：http://fmn.cc/MKijVd

什邡事件中民众对工业建设产生的污染问题抗议并非首次，有媒体总结了 5 年来中国因环保问题而引发的八起群体性事件.包括众所周知的厦门、大连 PX 游行，什邡事件，也有天津等地的抗议活动。

新闻：http://fmn.cc/L0XJ2d

新疆

6 月 29 日，官方证实今日有 6 名劫机者欲劫持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一家航班，据悉是当日 12 时 25 起飞的天津航空执行新疆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GS7554 次航班发生劫机事件，天津航空成功制止了该次劫机，随后 GS7554 次航班安全返回新疆和田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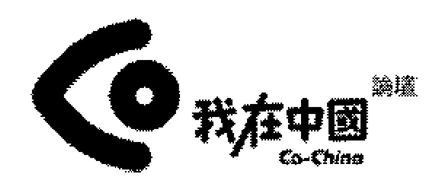
新闻：http://fmn.cc/M7qXKu

http://fmn.cc/LksrQt

29 日下午，就有机上网友介绍，飞机起飞后 20 分钟左右遭遇劫机，其中 3 名劫机者坐在机舱前部，3 名坐在机舱后部，坐在前部的歹徒持有雷管、拐杖。一名歹徒装作拄着拐杖的残疾人在机舱走动时突然开始发动袭击，机上乘客制服了这 6 人，并有乘客和安保人员受伤。

新闻：http://fmn.cc/LkxUXN

事件发生后，官方报道称发生劫持事件的 GS7554 航班上共有乘客 92 人机组成员 9 人。据天津航空透露，本次航班于 12 时 25 分自和田起飞，12 时 31 分遭 6 名劫机者暴力冲击驾驶舱。BBC 报道指，新疆自治区新闻办主任侯汉敏透露，六名劫机者均是维吾尔族男性，他们曾试图用改装的钢管拐杖砸开驾驶室的舱门，但不成功。



新闻：http://fmn.cc/M7rkF5

http://fmn.cc/M7rlIY

6 月 29 日晚，**新疆和田**称已经初步查明 6 名劫机者身份，公布了他们的姓名，且将这一事件定性为"是一起以劫持飞机为手段的严重暴力恐怖案件"。由于有报道指机上有 20 名警察，现场网友指出网友称并没有 20 名公安在飞机上，只有 5、6 名出差的警察。

新闻：http://fmn.cc/KS4lQv

直到 7 月 2 日，《环球时报》开始披露一些有关**和田**劫机事件细节，报道中确认了现场乘客所说的一些情况，但称劫机者的目的是"机毁人亡"。其英文版还指出有 4 名劫机者受伤，其中 2 人死亡。

新闻：http://fmn.cc/M7ruwa

http://fmn.cc/M7rJ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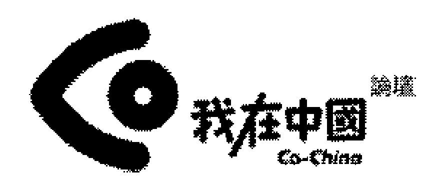
7 月 4 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 6 月 29 日**新疆和田**劫机事件的新闻，包括劫机者拄着拐杖进入机场和通过安检的视频，以及受伤的劫机者在医院中的采访画面。节目中一名劫机者称，6 月 29 日，他与另外 5 人参与了劫持飞机，目的是劫持飞机出境，进行(所谓的)伊吉拉特"圣战"。

新闻：http://fmn.cc/MTjRbF

和田劫机事件发生后不久，7 月 4 日上午，张春贤考察乌鲁木齐某反恐部队时，称要"对各种敌对势力要高度警惕，攥紧铁拳，"三股势力"从哪里冒出来，就在哪里把它打下去，让暴力恐怖分子没有藏身之地"。

新闻：http://fmn.cc/Mwkw79

新疆伊犁 6 月 30 日发生了 6.6 级地震，当晚 19 时 30 分，地震已造成伊犁州直 9 个县市、94 个乡镇、64569 人受灾，35 人受伤，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23248 人，牲畜死亡 3217 头(只)，直接经济损失 61715 万元。而一名新疆的中学生因被指"传播谣言"被公安部门控制。



新闻：http://fmn.cc/LNHwi5

香港回归 **15** 周年

胡锦涛 6 月 29 日抵达**香港**出席回归 15 周年庆祝活动和新一届特首就职仪式，他在机场表示，"在未来的两天多时间内，我希望多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香港的发展进步，深入了解香港市民的生活和期盼。" 当日下午胡锦涛检阅了驻港部队。

新闻：http://fmn.cc/LksWdr
http://fmn.cc/LkCuVM

胡锦涛 7 月 1 日出席**香港**特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并提出"依法治港、精诚团结、勤政为民、登高望远" 四点希望。梁振英致辞时称要"改善民生，推进民主"。

新闻：http://fmn.cc/LIvUL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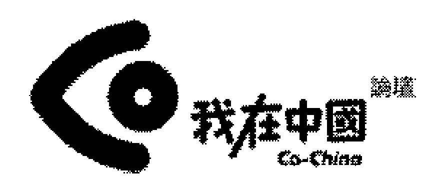
大批**香港**民众 30 日在中环示威区内示威时，遭警方喷射强力胡椒喷雾，同时附近公厕停水导致民众无法清洗胡椒。另外现场采访的媒体记者也未能幸免，也被警方喷了一身胡椒喷雾。

新闻：http://fmn.cc/LIxwVs

7 月 1 日下午，**香港**各界团体和市民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大游行，事后警方表示有 5.5 人从维多利亚公园起步，而主办方则表示，参与游行的人数有 40 万人。

新闻：http://fmn.cc/MWcxPo
http://fmn.cc/LJbPof

香港新特首梁振英及其政府成员 7 月 1 日正式宣誓就职，2 日香港记协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受访的 663 人中，认为梁振英上台后香港新闻自由会减少的人有 59.6%。因此有 58.8%的受访者期望梁振英上台后，不启动 23 条立法程序，以捍卫新闻自由核心价值。这一结果显示梁振英对新闻自由的影响惹人严重关注。



新闻：http://fmn.cc/KVEC9G

重庆

6 月 29 日上午 9 点，方洪（网民：方竹笋）起诉重庆市人民政府对其非法劳教案在重庆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重庆第三中级法院判决认定重庆市劳教委对方洪的劳教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正确，故判决其行政行为违法。方洪因去年 4 月份不满薄熙来在李庄案上的处理，因此发了一条讽刺微博，随后被判劳教一年。

新闻：http://fmn.cc/OCcEB9

重庆市政府公众信息网 6 月 28 日发布通知，经 2012 年 6 月 25 日市人民政府第 127 次常务会议决定：免去王鹏飞的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局长职务；李阳的重庆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总队总队长职务。

新闻：http://fmn.cc/M7t1Ck

据新华社报道，6 月 20 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称，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 年 6 月 26 日接受了王立军辞去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立军的代表资格终止。

新闻：http://fmn.cc/MWbRJZ

6 月 22 日，重庆市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出席共产党的十八大代表共 42 名。此前因李庄案中起诉李庄的么宁没有出现在名单中。

新闻：http://fmn.cc/KS2Bqo

本周其他重点新闻

6 月 30 日下午 16 时许，天津蓟县莱德商厦发生火灾。截至当晚 23 时，初步确认 10 人死亡，

16 人受轻伤，多人跳楼逃生。媒体报道指，火灾原因可能是空调室外机超负荷工作起火，而火灾发生时，商场负责人担心顾客不给钱曾将商厦一楼的大门封闭。

新闻：http://fmn.cc/M7wMrl

http://fmn.cc/M35qTh

7 月 1 日媒体报道指，天津莱德商厦附近的蓟县人民医院在火灾发生后便进入紧急状态，有伤员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救治。工作人员则推测五楼顾客伤亡会多一些。火灾发生时，商厦从一楼到五楼都在燃烧，浓烟滚滚遮天蔽日；有围观市民自发用石头砸碎商厦玻璃，试图帮助里面的人脱困。截至该报道发稿时，仍有家属尚不知其遭遇火灾的亲人下落。

新闻：http://fmn.cc/MNd84y

6 月 25 日发生的中山沙溪的聚集事件本周已经逐渐平息，上月底官方发新闻称要对滋事人员“见一个抓一个”，同时证明有多人在事件中受伤。28 日晚还有一些周边村庄的人们自发进行安保工作，镇政府门外则是不断巡逻的车辆。还有网友将拍摄的 27 日镇上的场景一部分发布在了网上。

新闻：http://fmn.cc/LlXdXO

图集：http://fmn.cc/Mx3K7d

截至 7 月 3 日，广州 39 个政府部门公布“三公”账本。其中，广州城管局的出国考察记录成为热议焦点，该部门一年内赴日本、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东欧、英国、新加坡、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十地考察学习。该局 2010 年共 20 人出国，平均费用达到 5.7 万元每人次。

新闻：http://fmn.cc/M7wh0C

广州市政府 30 日晚宣布，广州市将于 7 月 1 日零时起正式实施中小客车总量调控交通政策，此通告将试行一年，未来一年内，广州市中小客车增量配额为 12 万辆，每月 1 万辆。这一消息的突然发布导致当晚广州车市通宵营业，工作人员争分夺秒通知客户前来买车，并加班加点



帮买家办理购车手续。

新闻：http://fmn.cc/M7wAZc

http://fmn.cc/M7xDbG

《西安晚报》记者因报道县委领导抽天价香烟被停职，事件引发各界声援。随后石俊荣在微博上证实被停职，且报道有不周全之处。7 月 4 日石俊荣再次发消息表示，已经复工，感谢关注他的所有人。

新闻：http://fmn.cc/LFHy5s

http://fmn.cc/M7ymJP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6 月 30 日表决通过的出境入境管理法加大了对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处罚力度。此外，出境入境管理法规定：外国人非工作类居留证件的有效期最短为 180 天，最长为 5 年，但工作类居留证件的有效期最短为 90 天。

新闻：http://fmn.cc/M7xu85

7 月 2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称，苹果公司已与深圳唯冠就 iPad 商标案达成和解，苹果公司将为此支付 6000 万美元。法院已于 6 月 25 日向深圳唯冠与苹果公司送达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已经正式生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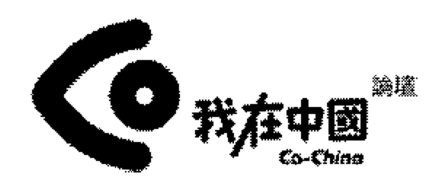
新闻：http://fmn.cc/N3uDKU

因流浪汉睡桥下影响市容，广州白云、天河多处天桥和高架桥底浇筑了水泥锥，同时深圳等地也发现这些水泥锥。第二日，广州市建委回应桥下建水泥锥，承认的确为防流浪汉而设，并已经建造了 10 年。

新闻：http://fmn.cc/LXbbWn

http://fmn.cc/Nr8FI5

7 月 4 日上午 6 点 35 分左右，台湾活动家乘坐的渔船“全家福”驶入钓鱼岛的日本毗邻水域。该



船在上午 7 点 15 分左右进入日本领海。“全家福”附近还有 4 艘台湾巡视船航行，一艘巡视船的电子显示板上打出了“这里是中华民国的领海”的字样。

新闻：http://fmn.cc/MTIG8z

http://fmn.cc/Rbh2FV

【返回目录】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三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若希望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和个人陈述（说明希望加入志愿者团队的原因）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1510 周刊（http://weibo.com/1510weekly）

编辑：丁昕、黄雯怡、宗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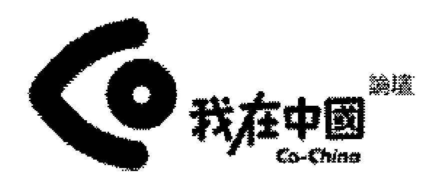
校订：童亚琦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潘雯怡

技术支持：毛向辉、舒欣



出品人：杜婷

